

一則「海氛」紀事的輯印史： 〈偷頭記〉在近代中國的流傳與寓意改造(1863–1957)^{*}

鄒子澄^{**}

摘 要

〈偷頭記〉是寧波士紳徐時棟在追憶鴉片戰爭時創作的一篇記事文。本文追溯故事的流傳，探討不同時代的人如何輯印這一文本，並分析後世如何出於不同旨趣，改造這個故事的內容與寓意。從文本的流傳來看，清末董沛、陳康祺、沈鎔經與孔廣德等人輯錄此文本或將其附入其他書籍，使之「藉附以傳」，是這一地方故事得以流行全國的關鍵。至民國時期，此故事已經成為各類出版物中常見的內容，後來又被馬克思主義史學著述引述，逐漸在大陸確立歷史常識的地位。從文本內容的改造與寓意來看，徐時棟本來強調「偷頭」活動的自發性，暗含對揚威將軍奕經消極行動的不滿。而沈鎔經等輯印者，卻不再由此事聯想過去的歷史，而是把自己對中西關係現狀及未來的悲觀認識寄寓其中。同時，儘管在徐時棟的原初文本中並未交代，但徐保與黑水黨卻逐漸成為故事公認的主角。他們的盜賊形象，因動員宣傳的需要，在抗日戰爭時期被徹底改造為抵抗外敵的民族英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述接受這一形象，將黑水黨與三元里事件塑造為近代中國民眾最早的自發性對外抵抗。〈偷頭記〉文本在後世的流傳與改造，展現出不同時代認識及主觀建構鴉片戰爭歷史意義的特殊歷史。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西關係史、書籍史、歷史書寫

^{*} 本文初稿得到業師戴海斌與石祥、徐世博、孫青等師長提供寶貴建議，又於2021年5月復旦大學「近代中國的閱讀和閱讀文化」研討會上得到陸胤、溫海波兩位老師提出修改意見，復蒙高昊老師指點寫作章法，兩位匿名審稿人及協助校潤之匿名專家提供細緻又極具啟發的評審意見，此外又曾得陸銘傑同學幫助校對，於此一併敬致謝忱！但文中一切錯誤，仍由本人負責。
收稿日期：2021年8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15日。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一、前 言

道光時代的鴉片戰爭（晚清人曾稱爲「海氛」），¹儘管在今日是人人熟知的重要史事，但很少有學者特別留意這一歷史知識形成的過程。戰後的一個世紀中，不同時代的人怎樣通過書籍的閱讀、纂輯與刊印，認識並傳播有關鴉片戰爭的知識，在事後理解甚或重構其背後的中西關係史寓意，形成不同時代對近代史獨特的認知方式，是一直未受到足夠關注的重要問題。而近來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諸如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休斯夫人」號事件這類中外關係史上重要事件的歷史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後世歷史書寫與記憶方式建構的結果。²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有關這些事件的史料以何種方式被編選出來，也潛在地約束後人能夠利用它們書寫怎樣的歷史。³這些都是理解鴉片戰爭歷史知識建構方式的重要視角。

本文聚焦一則寧波士紳爲追憶鴉片戰爭（若無特別說明，皆指 1840 至 1842 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而寫作的文本〈偷頭記〉，一方面考察它被史料叢刊採擇出版以前極其特殊的輯印經歷，另一方面展現它在後世的寓意改造過程。文中的「輯印」，特別指文本被編選進入不同印刷品，與其他入選文本構

¹ 第一次鴉片戰爭親歷者常用「海警」、「海氛」、「寇變」等語詞指稱此事，「鴉片戰爭」是一種後起的稱呼。

²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5-248; 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5-68; James Flath, "'This is How the Chinese People Began Their Struggle': Humen and the Opium War as a Site of Memory," in Marc Andre Matten,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12), pp. 167-192.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5-113；吳義雄，〈時勢、史觀與西人對早期中國近代史的論述〉，《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頁 79-101；楊金華，〈林則徐的形象演變與記憶建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7 年 5 月）。

³ Henrietta Harrison, "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3 (June 2017), pp. 680-701.

成意義互動，並因印刷方式之差別，不同程度地流傳開來的過程。最初〈偷頭記〉反映出寧波士紳群體在鴉片戰爭中的特殊遭遇和流散記憶，但光緒年以後，這一則地方故事逐漸脫離地方語境，通過書籍市場流行全國。故事在屢經轉引、重印之際，其內容及寓意都被重新改造，從而捲入複雜的文化建構中。本文關注〈偷頭記〉在不同印刷品中的印刷細節，包括內容增刪、附加按語、白話改寫、再創作、加入插圖，以及文本所嵌置的章節、卷目和其他「附本」（paratext）的角色，探究其流通與寓意改造的具體環節，並考察不同時期各異的輯印旨趣。既往研究除對此過程缺乏系統討論，在史料鉤沉方面更大有遺漏。⁴由於時間跨度大，涉及的材料種類、數量較多，本文仍不免有失收的缺憾，祈識者察之。

二、〈偷頭記〉的誕生

〈偷頭記〉是寧波府鄞縣舉人徐時棟（1814–1873）在鴉片戰爭結束二十年後方才追記的地方遭遇。作為當地有名的學者，徐氏平生大半時間居鄉，致力於藏書、校書與刻書事業。⁵1842年10月英國遠征軍進入寧波府，守城官棄城，他亦與鎮海舉人姚燮（1805–1864）一同避居城郊它山懸慈村秀才徐

⁴ 陳家平，〈鴉片戰爭中的浙江「黑水黨」〉，《歷史教學》，1963年第6期，頁9-11；陳傑華，〈黑水黨與「殺鬼隊」——簡介《黑水黨抗英紀聞》手抄本〉，《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頁81-83；沈雨梧，〈一支抗英人民武裝——黑水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頁62-66；季文一，〈《黑水黨抗英紀聞》質疑〉，《浙江學刊》，1985年第4期，頁120；林傑，〈求我山人和《黑水黨抗英紀聞》——與季文一同志商榷〉，《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頁102-107、轉頁41；師寧，〈黑水黨新探〉，《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第2期，頁7-12；賀秉元、屠文淑，〈浙東沿海軍民及黑水黨的反侵略鬥爭述略〉，《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8-14。

⁵ 徐時棟，字雲生、定字、同叔，號澹齋、柳泉等，寧波府鄞縣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式舉人，曾報捐內閣中書。張舜徽認為他讀書考證皆有長處，而其別集《煙嶼樓文集》則以「敘記之文，居其大半」為特點，寓有「表章鄉邦文獻」的用心。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57。徐時棟生平概要，可以參考龔烈沸，《徐時棟年譜》（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

兆蓉（1809–1863）處。據姚燮說，⁶徐時棟即便是亂中避居，仍舊整日埋頭讀書，不過也偶爾與塾師王鶴翔（1811–1842）等友人「慷慨時事」。⁷至同治二年（1863），⁸徐氏方才追憶昔日見聞，寫作〈偷頭記〉這篇記事文，稱 1842 年英國人佔領寧波府數月後忽然撤出，是因為畏懼數月間城中接連發生的盜賊「偷頭」事件。當時屯駐鄰府紹興的揚威將軍奕經（1791–1853）因為大兵攻剿不克，轉而懸賞「鬼頭」，於是有「偷兒」潛入淪陷的寧波城內趁夜「偷頭」，「夷兵」、「夷酋」接連丟了腦袋，只好時刻提防，最後因不能忍受城廂中的恐怖氛圍，便「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⁹

乍看下，此文所述光怪陸離，較難徵信。文中最吸睛的筆墨，無疑是盜賊偷頭的場景：

夷之據府城也，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磔格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著夷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鞋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頭，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籍口寘諸橐，網之以縋出城。或為夷所見，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己也，廢然而返。夷巡視城上，亦往來通夕。群偷數十，各以長籐為環，喑默候城外，聞城上巡者過，為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籐環鉤其頭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而候之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蹶，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為偷所鉤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鬼頭至者，黨日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眾。其奇策秘術，人莫得而詳也。

⁶ 姚燮後來贈徐時棟詩云：「昔遭海上氛，與匿蘭江陬。雖墮荊棘中，未肯白日偷。」路偉、曹鑫編集，《姚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冊 4，頁 901。

⁷ [清]徐時棟，《煙嶼樓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光緒元年葛氏松竹居刻本），冊 656，卷 22，〈王警庵墓志銘〉，頁 361 下-362 上。

⁸ 徐氏文集中幾乎每文都以干支註出創作年分，〈偷頭記〉作於癸亥年。[清]徐時棟，《煙嶼樓文集》，〈目錄〉，頁 187 上。

⁹ [清]徐時棟，《煙嶼樓文集》，卷 16，〈偷頭記〉，頁 325 下-326 下。後文引用此文不再出註。

在眨眼間「偷頭」奪命，好似項上人頭可輕易取走一般，顯然是想像之辭。講述各種「奇策秘術」之細節，竟然如在場目睹般生動，也讓人懷疑故事的真偽。民國掌故家徐凌霄、徐一士讀過此記，即表示「徐氏所述，容有傳說過甚之處，英人殆不至若是之愚笨，而使偷兒之技屢售不已也」；¹⁰版本文獻學家王重民先生亦將此記歸入四部分類法下史部中較富主觀色彩的「史評」。¹¹故而研究須從考察「偷頭」事件是否憑空捏造開始。所幸〈偷頭記〉雖未以親歷者口吻直敘見聞，講述方式又有很強的文學性，卻還是點明了時間、地點及人物等可資查證的細節。

根據英國遠征軍成員當時的紀錄及清廷檔案文書來看，故事的實際歷史背景，是揚威將軍奕經在主持「浙東反攻」時，曾大量僱用伏勇殺害、綁架淪陷區的英方人員，而伏勇在行動中經常割取屍體首級及肢體，以帶回軍營領賞。「偷頭」手法屬於文學虛構，自不待言；但此外〈偷頭記〉的描述還特別強調這場行動的自發性，而淡化清廷的推動作用，雖然失實，不過在另一層面上，卻特別反映出作者所欲賦予這一故事的原初寓意及背後心態。強調收復行動的自發性，與浙東紳民對大軍集結後卻長期消極行動的不滿有直接關聯。下面結合中英兩方史料說明有關的歷史背景。

（一）揚威將軍奕經與「浙東反攻」

〈偷頭記〉稱：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西夷英吉利據寧波府。明年正月晦，我師襲攻之，不克。是時大軍屯紹興府，而舒君厚庵者以累官寧波在軍中。一日，縛間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死。舒君視其人，則府之善為偷者

¹⁰ 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澤昱編輯，劉悅斌、韓策校訂，《凌霄一士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18），中冊，頁 867。

¹¹ 王重民、楊殿珣等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427。按史評類大多「發抒是非褒貶之意」，四庫館臣對此頗有微詞，稱其多「鑿空生義，僻謬不情」，而抑置史部最末一類。但也有今人認為這一看法有失偏頗。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79-81；李致忠釋評，《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頁 307-309。

也，意哀之，曰：「若為諜而死，盍為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大將軍商賚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為奴、而戰以為兵者為黑鬼。既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大將軍，大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若，乃與群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逾城鑽穴隙，日昏暮，遍府中無非偷者。……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於是大將軍以克復寧波府入告，升擢敘錄各有差。當是時，群偷暴富，而偷長三四輩且得大將軍所賜功牌，以五六品冠帶榮里中。

內中交代，「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國繼攻佔定海、鎮海後，又攻陷寧波府城（實為西曆 10 月 13 日），浙東告警。次年中曆正月三十日（「明年正月晦」），由揚威將軍奕經主持「浙東反攻」（實為廿九日），未能成功，便有「懸賞鬼頭」之計。這些文字其實已經提示了偷頭故事據以創造的真實歷史背景。所謂「浙東反攻」，不僅持續時間極長，而且主要是發生在非正面戰場的較量。奕經因顧慮浙東地理不適宜以大兵攻剿，¹²所以特別依賴壯勇的「明攻暗伏」。在佔據寧波府後代理民政的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事後回憶便說，「1842 年大軍終於集結完畢後，奕經的全部行動卻不過是綁架走失的外國人，並將他們囚禁於籠中」。¹³從奕經歷次奏摺可見，十二月他即已在寧波、鎮海城內「暗伏均有一百餘人」，¹⁴次年正月，潛伏者已有所行動，在「寧郡之靈橋門外江廈地方及定海西門外，均經斬殺白黑夷匪，彼時因恐逆夷大眾知覺，已將死身掩埋，或投入海中，未能呈驗首級」，奕經亦「分別酌賞頂帶銀兩」。¹⁵

¹² 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下略），《浙江鴉片戰爭史料》（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下冊，頁 12-13。

¹³ Charles Gu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Including a Sketch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2), p. 182.

¹⁴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18。

¹⁵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35-36。

1842年3月10日夜，清軍裡應外合、正式反攻失敗後，奕經並未遭到懲處，在道光帝鼓勵二次進軍後，他仍「遣妥實勇壯，潛赴寧、鎮兩城，暗中散布謠言，多方擾亂」。¹⁶後來奕經更樂觀地拜摺報告說英人「懼我暗攻」，故二月以來「精選南北兩路鄉勇，暗赴寧鎮各處分投埋伏，隨時斬獲」，「先後又擒獲白黑逆夷三名，又兩次誘令夷兵乘坐小船溺斃二十餘名，焚燒房屋，既飲食中毒，乘間刺殺，亦斃有多名」，城中英國人已至「每逢出入，結伴同行，偶至城外，亦多方防護，在岸既恐誅擒，在船又防燒毀，畏首畏尾，晝夜不安」的地步。¹⁷儘管奏報的數目不可盡信，但奕經曾派人潛渡回城擾亂，溺斃、擄走英軍兵弁，本屬史實。這類事件的消息或謠傳，或許曾傳入避居鄉間的徐時棟耳中，成爲〈偷頭記〉一文據以創作的現實背景。

〈偷頭記〉提到官府獎勵，在檔案中也可以找到對應的證據。爲鼓勵軍心，道光帝曾向奕經軍營撥派大量花翎、搬指、頂帶等物，飭云官弁兵勇中如有「拔幟先登，不避烽焰，斬獲夷目者」，¹⁸即可賞賜，並據實保奏；後又補撥新製武功賞牌 750 張（對應銀約 70,000 兩）。¹⁹這證明〈偷頭記〉中提到的「功牌」、「五六品冠帶」（檔案記爲六、七品頂帶）以及「升擢敘錄」（保奏後所得獎敘），並不是作者的虛構。

（二）寧波淪陷時期對遠征軍的戕害及綁架事件

當時駐紮寧波的英軍回憶或紀錄中，則有不少關於中國「綁匪」（kidnappers）「野蠻行徑」的記載。在他們的見聞中，將人生擒後以裝入麻袋等辦法帶出城外交予清軍（背著翻過城牆，或藏匿於船中通過水門出城），與就地殘殺後割取肢體或頭部，是這些綁匪主要的兩種行動方式。這些行兇者的目標，一般都是沒有武裝的士兵，但也包括那些曾給英軍提供幫助的中國

¹⁶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122。

¹⁷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142-143。

¹⁸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10。

¹⁹ 《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20-21。結合事後報告，武功賞牌一共發出 40 張，花翎等物，撥發半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下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冊 6，頁 529-530。

人。此外，遠征軍成員明確認識到，這並不是民間自發的抵抗，清廷是這種系統性綁架行為背後的僱主，是「俘虜交易」的推動者。²⁰穆瑞 (Alexander Murray) 就曾抄錄當時裕謙為鼓勵綁架行動而發布的告示及賞格譯件。²¹這些遠征軍成員將鼓勵綁架視作不文明國家的野蠻行為，對清廷加以譴責。²²據賓漢 (John Elliot Bingham) 稱，當時共有 42 人被擄走，其中幾位不僅遭到殘忍殺害，屍體還被嚴重破壞 (murdered and mutilated)，其餘人則被解送至杭州府囚禁。²³

郭實獵身邊一位匿名軍官在私人信函中，詳細地記錄了他所知道的暗殺及綁架事件。1842 年 2 月 24 日，該軍官稱：過去三、四周內，寧波有一名士兵失蹤，鎮海有一名士兵被毒殺，並發現一名運輸艦船員的無頭屍體，一名“Lascars”號船員被綁架，可能已遇害。²⁴4 月 18 日又說，鎮海有兩位“Lascars”號船員被害，“Blonde”號有三人因為潛伏者蓄意製造爆炸案受重傷，郭實獵僥倖生還。五周前失蹤的第 26 團士兵，其無頭屍體現於某處河渠中找到，穿戴依然整齊。“Modeste”號的一位皇家海軍陸戰隊士兵及馬德拉斯炮兵部隊的兩位士兵被劫走。²⁵19 日記，一位本地巡捕 (Chinese police, 即受郭實獵僱傭維持治安的本地人) 被「塞進麻袋」(bagged)，幾日後在一艘

²⁰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2nd ed.), vol. 2, pp. 315-316.

²¹ Alexander 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pp. 123-128.

²²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p. 225.

²³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pp. 314-315.

²⁴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As Sketched in Letters to His Friends, by a Field Officer, Actively Employed in that Country. With a Few Concluding Remarks on Our Past and Future Policy in China*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p. 122.

²⁵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pp. 142, 145. 這位海軍陸戰隊成員險些被擄走的傳聞，又見：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pp. 315-316.

試圖偷渡出城的船隻尾部，發現了這位「口中塞布、五花大綁」（gagged and bound）的本地巡捕。²⁶

5月6日又記，4月28日在寧波城中距離指揮部很近的院子內，發現了一位失蹤的第49團士兵，他在白天被勒死後塞入麻袋。隨後英軍便燒燬該屋及周圍鄰房。此事讓駐防士兵極為憤怒、激動。4月30日，“Columbine”號水手在城外北郊迷路，險些被綁架者擄去，危機時刻他利用匕首逃生。在鎮海有一位皇家海軍士兵及黑人廚師失蹤。²⁷此外，寧波本地巡捕總頭同其配偶一併在總部外一英里處失蹤，同屋中其他人皆遇害，女性喉嚨全被割破。²⁸類似的綁架事例，在其他遠征軍成員紀錄中還有不少，此處無法全部列出。在浙東遭遇系統綁架的消息，也傳到了南方的澳門與香港。²⁹

從以上分析看來，直到5月7日駐軍退出寧波府，與援軍會合開始執行「揚子江行動」（the Yangtze Campaign）前，英國皇家海軍士兵、一般海員、印度士兵、僕從、本地巡捕被綁架與殘忍遇害，對浙東駐防遠征軍官兵無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衝擊。遠征軍高層雖然採取了張告警示、出城清鄉、嚴懲嫌犯、令軍隊在運輸艦過夜、主動進攻寧郡周圍清軍駐紮的縣城（慈谿、餘姚）等措施，³⁰但效果有限，城廂中仍不斷有中英人員失蹤。恐怖、不安與憤怒的情緒同時在遠征軍中蔓延開來。³¹

²⁶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p. 147. 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被營救的，還有一個教英國軍官中文的中國老師，和另一位海軍陸戰隊成員。Alexander Murray, *Doings in China*, pp. 129-130;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p. 315.

²⁷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pp. 150-152. 這裡的黑人廚師，亦不排除為印度人的可能。

²⁸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p. 160.

²⁹ “Recent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in China, and Actual Position of the Belligerent Parti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5 (1842), p. 294; Granville G. Loch,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The Operations in the Yang-Tze-Kiang; and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John Murray, 1843), pp. 26-27.

³⁰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頁136-137。

³¹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p. 316;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p. 226;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pp. 154-155.

遠征軍在 5 月正式退出寧波時，以海軍司令巴加（Sir William Parker, 1st Baronet, of Shenstone）與總指揮郭富（Hugh Gough, 1st Viscount Gough）的名義發布告示，特別表達對清朝官員數月來慫恿拐掠及殘害屍體等野蠻行為的不滿：

清官誘汝，自誇進剿大英軍士，業經再三戰敗，不肯公然打仗，乃私調匪黨兇手，往來拐掠。如獻首級，即行厚賞，及給頂戴為官。此等惡弊，最玷辱與大國也如此。其匪類於城廂遍處雲集，加殃良民，拆屋搶殺，若問其原故，止是因官府自己無膽，而用天下之惡魁，以成其刁兇之計。³²

在離開郡城之際，英方特別指責清政府因無能而求助於「玷辱大國」的恐怖手段，與其對華作戰時試圖離間官民關係之一貫作風，以及對當時國際戰爭慣例的理解有關，但也很可說明當日綁架與刺殺的規模，確實達到嚴重影響浙東佔領區秩序的程度。

刺殺與綁架案頻發的直接原因，是遠征軍選擇駐紮浙東、等待援軍這一決策，導致己方陷入被動局面，並且面臨與中國民眾共同生活、維繫日常秩序的複雜狀況，譯員不足也帶來種種困難。³³有學者從英方史料中看到，遠征軍本想以佔領寧波府作為脅迫清廷開啓談判的籌碼，不料作繭自縛，在清軍的包圍中（寧波守軍只有約 750 人，而奕經號稱陸續集結有十二、三萬兵勇），處處受制於綁架、刺殺及火筏的威脅，最終反而成就奕經以「大勝」入奏，振作了道光帝的「剿夷」信心。³⁴

中英兩方面的史料共同證明，〈偷頭記〉所講述的這則故事絕非完全杜撰。儘管「偷頭」的手法大部分屬於作者的想像，但是對遠征軍及為其服務的中國人的綁架、暗殺與屍體破壞，是在寧波淪陷時實際發生的現象。這種系統性綁

³²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頁 146。標點較原書有改動。

³³ 關詩珮特別指出遠征軍官兵在追緝寧波綁架者時因譯員不足而寸步難行的問題。見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 106。

³⁴ 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186-213.

架與謀殺，其實是由奕經主導的「浙東反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換言之，這一恐怖事件並不是民間自發的行為，清廷的鼓勵與實際獎勵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而，除了文學性虛構外，〈偷頭記〉還有一些明顯的史實性失真。首先，正月總攻失敗後，奕經直接後撤至杭州府，而故事的第一幕場景卻設定在紹興軍營，稱奕經、舒恭受從此開始獎勵盜賊「偷頭」。其次，綁架與暗殺行動，在正月總攻之前便已發生，但故事卻說這是總攻之後才有。再次，徐時棟稱每天報告「失首」者從幾十至百餘不等，明顯誇大了數目。最後，遠征軍退出寧波，最主要的原因是增援已經抵達，可以開展進一步行動，並非故事所宣稱的對綁架與暗殺事件的恐懼。由此看來，應該可以說〈偷頭記〉是徐時棟基於真實事件，發揮想像力與文學稟賦所構造出的一篇極其特殊的記事文。

不過從另一層面來說，故事的虛構方式，也讓人更容易理解作者所欲賦予故事的寓意。表面上看，〈偷頭記〉是在表彰一群不尋常的盜賊。末尾說：

徐子曰：此古之兵法也。昔楚子發戰齊師，不勝，使市偷夜竊齊將之幃帳與其枕其簪而還之。齊將懼楚人取其頭也，捲甲以去。楚以偷退齊師，今以偷退夷軍，其道一也。鮮卑庭數犯邊，遣劍客刺之，而邊陲以安。御夷之法，固當爾耶！夫穿窬之盜，公羊氏所謂賤乎賤者也。茲乃以取富貴，克城池，是何以異於不龜手藥之可以敗越耶？庾信讚秦盜曰「於時大盜還作功臣」，而莊周不知兵，乃徒以負匱揭篋為巨盜，其亦小視之哉！

單由此處看，故事大旨應該是說，即便是盜賊也可成就一番功業，不該對其身分有刻板的認識。而實際上，作者對「偷頭」行動自發性的刻意強調，則表現出貫穿整個文本的另一種寓意。前文已經由清廷檔案揭示出，官方的獎勵是促成系統性綁架最重要的原因。但徐時棟卻在故事中顛倒了官方獎勵與系統性綁架的因果關係。在文本中，以「夷人」的頭換取獎勵，不是官方主動提出的策略，反而是群偷模仿第一位獻頭獲賞者促成的結果（「又既而獻頭者紛若，乃

與群偷計其值」)。與此同時，官方在這場行動中的策劃角色被弱化了，仿佛城中行動全無指揮，行動方式任憑自定。最後還暗示大將軍奕經竊取了收復寧波這一完全不屬於他的功績（「於是大將軍以克復寧波府入告」）。在別處，徐時棟更是直言：「辛丑八月，西夷據郡城。明年四月去之，則偷兒夜竊鬼頭之力也。」³⁵種種敘述傾向共同反映出，〈偷頭記〉中並未明言、但讀者可以強烈感受到的另一寓意，是對揚威將軍奕經不作爲、無能的不滿與諷刺。與徐時棟交情甚篤的同鄉後學、進士陳康祺（1840–1890）在轉述〈偷頭記〉時，就補充說：「寧波之復，偷兒徐保、張小火及其黨六十人力也」，將軍奕經、參贊文蔚奏曰收復，其實是「張皇戰功」。雖然陳康祺仍不忘辯白自己轉述此記，「非欲翹將軍、參贊之過也」，³⁶但也暗示出原作者的這一層寓意。儘管有史學家曾對奕經在浙東主持的反攻表示讚賞，認爲在雙方軍事力量差距巨大這一前提下，「游擊戰」可行性更高，³⁷但對當時浙東流散的士民而言，盼來大兵出征卻只見其長期消極活動，很難不生怨言。他們或許很難想到，官方的實際反攻方式，除了正月末那場夜間的正面總攻外，竟主要是在戰場之外鼓動兵勇及群眾進行綁架和暗殺活動。當時謠言說：「杭州娼妓最堪誇，明年養出小欽差。紹興娼家亦有名，明年養出小兵丁。惟有寧波娼家哭不止，明年養出小鬼子」，³⁸正表達出這些流散士民的情緒。

³⁵ [清]徐時棟著，寧波市海曙區文物管理所整理，《煙嶼樓詩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卷1，〈鬼頭謠有序〉，頁8。在〈乞兒曲有序〉中（同書卷1，頁9），他更是說：「西夷據郡城積七八月，郡中乞兒益窮餓，於是紛起向夷人索錢米。由城逮鄉村，泊旁郡他縣，與餘姚流丐之向在郡乞食者，男婦雜沓，攜持保抱，入城中呼號啼笑，日益眾，多至於數千。此時夷方以偷兒有戒心，見此愈驚恐，疑中國有陰謀，將倉卒襲取之者，始決計捨城去。是役也，偷兒之功什六七，乞兒之功什二三，是皆不可無作也。」

³⁶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下冊，〈徐時棟《偷頭記》〉，頁737。

³⁷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382。

³⁸ [清]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咄咄吟〉，頁253。

三、「吾鄉人皆能言之」： 「偷頭」傳說在浙東的流傳與初步改造

〈偷頭記〉後來成爲江南乃至全國流行的傳說，與鄞縣人徐時棟、董沛和陳康祺三人的著述最有關係，而其緣由，又可上溯至同治、光緒年三人一同參與重修《鄞縣志》的活動。鄞縣本爲寧波府的附郭，從宋、元兩代興修府志開始，直到明末，一直未曾自編縣志。清代康熙年後開始的歷次縣志纂修中，同治時期開始重修的《鄞縣志》（下文稱「同治志」）則是動用巨大人力、物力，改換舊志體例（原由錢大昕擬定），且全面更新鄉邦文獻的一次重要努力。鄞縣歷次纂修縣志的具體情況，請參見表 1。

表 1 清代鄞縣志編修及刊刻情況一覽（1672–1877）

簡稱	總修	始修 / 纂成 / 刊竣年分	卷帙	亡佚、燬板情況	經費來源
「壬子新志」	沈增	1672 年	20	原版、刊本皆無考，後世知者甚少。	未詳
康熙《鄞縣志》	聞性道	1683 年始修， 1686 年刊竣。	24	今見康熙二十五年刊本及康熙鈔本。	官費
乾隆《鄞縣志》	錢大昕	1788 年刊竣	30	原版藏縣衙甘露堂，1842 年燬於兵燹。1846 年邑人鄭增、鄭榮恩出資重刊，後又燬於兵燹。刊本現存。	官費
咸豐《鄞縣志》	周道遵等	1840 年代始修， 1855 年開始雕版， 1856 年告成並請官序。續有補刻。	32	刊本現存	周道遵等「自備資斧」，並勸同試用訓導林、竺二人協捐經費。
同治 / 光緒 《鄞縣志》	張恕、 陳勸、 徐時棟、 董沛	1868 年始設局， 1874 年纂成， 1877 年雕版竣工。 續有補刻。	75	刊本現存	楊坊捐資金「萬八千有奇」作志局經費，後由其子楊子京出資雕版。

資料來源：康熙、乾隆、咸豐、同治四種《鄞縣志》的序言、附識、未卷的〈舊志源流〉。見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康熙鄞縣志（附鄞志稿）》（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整理，《乾隆鄞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咸豐鄞縣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同治鄞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纂修「同治志」為清代鄞縣最高規模的修志之舉，由曾署江南蘇松太道、加鹽運使銜的鄞縣人楊坊在晚年捐贈「白金萬八千有奇」的巨資，³⁹維持至少 19 人規模的志館。而即便有巨額資本支持，「同治志」亦遇到諸多困難。除「人事作輟」外，⁴⁰因為抱持新志必須能夠取代錢大昕舊志的雄心和壓力，徐時棟等在擬定體例時便規定，要將錢大昕引用不準確的古書原文「各查取本書，一一核正」，⁴¹且遵照高規格的國史館體例，在 75 卷巨帙中做到「凡引必註」。為此，志局中人甚至將志局直接從校士館轉移到徐氏寓中，並至同里盧氏抱經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檢核古刻舊抄，「搜採繁富至千數百種」，才告成大功。⁴²徐時棟身故後，志局被託付給回鄉的進士董沛（1828–1895）。

「同治志」選刊〈偷頭記〉，是該文本在浙東流通開來的一個節點。咸豐《鄞縣志》雖然在性質上仍是續修錢大昕乾隆《鄞縣志》，增補不多（30 卷續至 32 卷），但已特別重視反映鴉片戰爭後的變化。其凡例第一條便說，舊志已沿用七十餘載，內容亟宜補正，「且遭夷難，兵制、海防、公署多有更改……尤不可不詳誌也」。⁴³待到修「同治志」時，徐時棟等總修除力圖超越錢大昕的舊志以外，考慮到太平軍所致書厄，也更加意保存鄉邦文獻。另一總修張恕所說：「東南兵燹，故家圖籍，什失其五、六，而吾鄉紀載，不至如杞、宋之無徵，此實宋元以來，薪火之傳，永永於勿替者也」，就特別反映出避免文獻失傳的顧慮。⁴⁴所以同治年重修縣志時，各總修也特別注意開闢新目類，並以「網羅舊聞，務取該備」作為第一凡例。⁴⁵〈偷頭記〉在此背景下入選「同治志」。

³⁹ 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整理（下略），《同治鄞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冊 1，〈目錄〉，葉 33a-33b。

⁴⁰ 《同治鄞縣志》，冊 1，〈目錄〉，葉 33b。此書「付工鐫刻，又閱二年」背後，或許有資金上的困難，最後應是由楊坊之子楊子京出資解決。

⁴¹ 《同治鄞縣志》，冊 1，〈新修鄞縣志凡例〉，葉 1b。

⁴² [清]徐時棟，《煙嶼樓文集》，〈鄞縣志傳〉，卷首，頁 180 下。

⁴³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整理（下略），《咸豐鄞縣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凡例〉，頁 11 上。

⁴⁴ 《同治鄞縣志》，冊 1，〈張恕序〉，葉 1b。

⁴⁵ 《同治鄞縣志》，冊 1，〈新修鄞縣志凡例〉，葉 1a。

〈偷頭記〉雖有明顯的文學虛構，且暗含不敬朝廷命官及皇親的命義（奕經為乾隆皇帝曾孫，道光皇帝堂侄，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但它在「同治志」中並非被視作奇聞異談，而被改造並認定為一則紀實性故事。〈偷頭記〉並不見載於「有關掌故之文、及其事可為法戒者」的「雜記」目類，而是附錄於新闢的鄞縣「大事紀」一類中（登載「凡縣中兵戎賑卹諸大事」）。此舉本有違反修志凡例之嫌，即「預修官書，例不載己作」，但其「凡例」則特別為此說明：「至有關掌故之文，究不可略也……今仿其例，一體甄錄，但標書目，不著姓名。」⁴⁶所以〈大事紀〉在附錄徐時棟〈偷頭記〉後，採取按例標註《煙嶼樓集》而不著撰人的辦法。

在「大事紀」目類下，「同治志」不僅全文附錄〈偷頭記〉，還將其轉化為一則紀實性更強的文本：

寧波有劇賊曰黑水黨，踰越牆屋，矯捷如飛，而徐保、張小火、錢大才等為之魁，葛雲飛、鄭國鴻殉定海，保竊其屍回營，奉旨錄用。舒恭受言於大帥，令保等選其黨六十人，分伏郡城，並於江中置八槳小艇，伺英人出，狙擊之。英人面白曰白鬼，其屬孟邁、孟加臘諸部，曰黑鬼。軍門令下，斬黑鬼一級，賞銀百兩，白鬼倍之，生獲者三百兩。保等出奇計，四散隱伏，兩月之中，擒斬數百。（原註：語詳〈偷頭記〉。）英人大恐，遂棄寧波，越二日，並棄鎮海，留其將羅卜丹駐守招寶山，以數船泊浹口。於是將軍參贊奏言：鎮海知縣葉堃、守備徐攢寶、批驗大使鄭鼎臣等迭次火攻燒船，獲級不可勝計。夷人惶懼，旋命副將托金泰、游擊高峻分兵襲擊，遂棄城逃遁，已於三月二十七日收復寧波。張皇入告，詔第諸將功，升賞有差。⁴⁷

這是〈偷頭記〉文本衍生過程中，最早出現「徐保」與「黑水黨」稱謂的一段紀錄。《煙嶼樓文集》中徐時棟原來並沒有使用這兩個稱呼。⁴⁸此外，這段紀

⁴⁶ 《同治鄞縣志》，冊 1，〈新修鄞縣志凡例〉，葉 1a-2a、3b。

⁴⁷ 《同治鄞縣志》，冊 5，卷 16，〈大事紀下〉，葉 26b-27a。引文下劃線為筆者所加。

⁴⁸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4，頁 164。

錄較原文的內容變化還有兩處（加下劃線部分）。其一，依據奏摺、上諭或墓志銘、墓表增補內容。如稱竊取葛、鄭二總兵屍體回營，後「奉旨錄用」。⁴⁹最後撮錄奕經奏摺，亦似自一道上諭轉引。⁵⁰其二，多出張小火、錢大才兩個姓名。《鄞縣志》對〈偷頭記〉的轉寫，⁵¹經曾預修縣志者的有意刊布，在很多寧波地方文獻中沿襲下來。然而在後世流傳的眾多衍生文本中，「偷頭」卻逐漸不再被提及，「徐保」和「黑水黨」則成了這個故事的標誌。

事實上，在鴉片戰爭時期確實有一位頗負名氣、名為「徐保」的民間人物，但是他並非以「偷頭」得名，而是因為偷回陣亡的總兵葛雲飛、鄭國鴻屍身而為人所知。1841年，原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1793–1841）在定海失陷後奏報，有「定海義民徐保兄弟四人，竊負總兵葛雲飛、鄭國鴻屍身來營」，詢知其「有踰牆走壁之能」。於是他「遣徐保飛赴定海密訪，舒恭受如果未死，該員素得民心，能用民力，本係浙江好官，囑其善為調養，糾集義民，以待大兵。倘能設法刺其頭目，則逆兵瓦解，更可轉敗為功」。⁵²可見徐保等人除了有偷回總兵屍身這一功績外，還因為身懷絕技，得到兩江總督的信任，被委以潛入淪陷的定海調查及聯絡的重任。同一年翁心存住在蘇州時，也從鄰居張應雲處（奕經的重要幕僚）聽說：「定民徐寶兄弟四人竊葛、鄭二鎮屍骸事。」⁵³關於徐保竊取葛雲飛屍身的傳說，同樣流傳到後世。從葛雲飛的墓志銘、墓表開始，徐保經常在與葛雲飛相關的傳說中出現。⁵⁴後世的筆記與墓志銘、墓表所述大體相同，稱葛雲飛壯烈陣亡後，「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

⁴⁹ 「至定海義民徐保兄弟四人，竊負葛雲飛、鄭國鴻屍身來營，有逾牆走壁之能，即著裕謙量材委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4，頁 207。

⁵⁰ 似據〈著揚威將軍奕經等於收復寧郡後乘勝收復鎮海海上諭〉，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收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5，頁 286；另亦可參考頁 256-258。

⁵¹ 咸豐《鄞縣志》對鴉片戰爭中寧郡經歷的描述原較簡單，由提督暨守城文武官弁逃跑而城陷、大軍反攻不克寫至「夷兵退據鎮海縣，郡城始復，撫卹難民」。《咸豐鄞縣志》，卷 29，〈雜識〉，頁 688 下。

⁵²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4，頁 164。

⁵³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冊 2，頁 488-489。

⁵⁴ 轉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冊 6，頁 346-350；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上海：中華書局，1926），上冊，頁 36-38。

雨霽月微明，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睽睽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踞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⁵⁵這個故事還被寫入《清史稿·葛雲飛傳》中，不過神異色彩稍有淡化，僅僅是稱「定海義勇徐保夜負其屍，浮舟渡海」。⁵⁶在這個源自徐保事蹟的另一個傳說系統中，他本人顯然是葛雲飛等忠烈的配角。大概是出於這一緣故，在後世，這一事蹟較少在以徐保為主角的黑水黨傳說中被提及。

「同治志」中的這段有關徐保活動的史事紀實，對浙東的史志書寫產生了很大影響。與徐時棟交誼至深、並為其撰寫墓表的董沛，在纂輯《明州繫年錄》（一種形式特殊的地方志）時便收入《鄞縣志》中的這段文字。⁵⁷隨後，寧波府下轄的慈谿、奉化、定海（鴉片戰爭後升定海直隸廳，由寧紹台道直領）三縣，在光緒年新修的縣志或廳志中，⁵⁸也都從《明州繫年錄》轉引了這則黑水黨抵抗事蹟。

除了文本流傳外，這個故事也以口頭傳說的形式在寧波當地流傳下來。在鄞縣，曾以「參修」身分協助編纂「同治志」的陳康祺，在轉述〈偷頭記〉時便稱「先生所述，吾鄉人皆能言之」。⁵⁹在鼓舞人心的「偷頭」故事表面下，鄉人或許也會如陳康祺一樣，想見當日家鄉淪喪於「夷狄」，「墳墓之鄉」中

⁵⁵ [清]黃鈞宰，《金盞七墨》（上海：進步書局，1895），卷2，〈定海再陷〉，葉10a；李孟符（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上海：廣智書局，1911），卷1，〈道光朝兩儒將〉，頁65。

⁵⁶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冊38，卷372，頁11532。從保存下來的三種清代國史館傳稿來看，徐保的事蹟在道光時期作傳之初便已有之，之後也未曾刪改。〈葛雲飛列傳〉，清國史館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下略），《史館檔》，故傳004764號；〈葛雲飛列傳〉，清國史館本，《史館檔》，故傳002566號；〈葛雲飛列傳〉，清國史館本，《史館檔》，故傳000649號。

⁵⁷ [清]董沛，《明州繫年錄》（光緒四年刊本），谷歌圖書掃描自哥倫比亞大學藏本，見：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6%98%8E%E5%B7%9E%E7%B9%AB%E5%B9%B4%E9%8C%84.html?id=85VFAAAAYAAJ&redir_esc=y（2023年12月11日檢索），卷7，葉9b-10a。

⁵⁸ [清]楊泰亨、馮可鏞纂，光緒《慈谿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光緒二十五年德潤書院刻本），冊36，卷55，〈前事·紀事〉，頁215下；[清]李前泮修，張美翊等纂，光緒《奉化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影印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冊31，卷11，〈大事紀〉，頁150上；[清]史致馴重修，[清]陳重威等纂，光緒《定海廳志》（影印光緒十一年黃樹藩刻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38，卷28，〈大事志〉，頁394。

⁵⁹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冊，〈徐時棟《偷頭記》〉，頁738。

「島夷錯居，橫流滔天」，⁶⁰士民流徙，朝廷派來的「大將軍」、「大官」、「大兵」毫無作為的歷史景象。即便是百年以後，民諺中仍然保存了黑水黨的抵抗故事。⁶¹這個故事提醒著後世的寧波人，鴉片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十分特別的一場災難，不僅寧波是當時唯一一座被英國長期佔領的府城，而且朝廷似乎對他們收復家園的期盼也視而不見。

這一節概述了偷頭故事在浙東的保存與流傳，並且指出地方士紳對這一故事的初步改造。他們基於官方檔案及地方傳聞，比較有依據地進行增補。改造成的新文本，被普遍地視為地方信史，並進入浙東各府縣的方志中。這一改造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就是讓〈偷頭記〉中原未提及的「徐保」與「黑水黨」成為故事主角。徐保本人偷回兩位總兵屍身的真實事蹟，在後世反而逐漸淡去、不為人知；而他領導一個無法考證的團體抵抗外國人的活動，卻成了足以成就他歷史地位的功業。

就偷頭故事的流傳來說，曾經協助徐時棟纂修《鄞縣志》的陳康祺、董沛，藉由其著作，將改造後的故事帶向更廣的地域。尤其是陳康祺有關〈偷頭記〉的轉述與補說，通過掃葉山房石印本向外流通開來，為很多人所閱讀，是後來報紙、雜誌轉述〈偷頭記〉的主要源頭。徐時棟的〈偷頭記〉原文，到民國以後，反而少有人問津。不過更廣的流傳也帶來新的變化。陳康祺、董沛以後的故事複述者，很少再與徐時棟本人有私人關係。決定這則故事講述方式的權力，也就不再專屬於鄞縣的鄉緣團體。故事的寓意，在講述方式的演變中被悄然改造。

⁶⁰ [清] 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冊，〈郎潛紀聞初筆序〉，頁 3。

⁶¹ 寧波市江東區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卷》（寧波：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1989），頁 302-303。

四、〈偷頭記〉的輯錄與「藉附以傳」（1881–1910）

同治《鄞縣志》雖錄入〈偷頭記〉全文，但根據方志傳播的規律，其印本一般不多，流入書籍市場的也十分有限。〈偷頭記〉跨出浙東地域而流通，實則另有通道。本節論證三種《中西紀事》活字印本（1881、1884、1887），石印本《郎潛紀聞三筆》（1910，原名《壬癸藏札記》）以及兩種石印本《普天忠憤集》（1895、1898）是使得〈偷頭記〉流通開來的關鍵。尤其是沈鎔經和陳康祺兩人從《煙嶼樓文集》中輯錄出〈偷頭記〉一文，把它「植入」相關書籍後，〈偷頭記〉才能「藉附以傳」。由於所附入的書籍一時風行，〈偷頭記〉得以在浙東之外的地域廣泛流通開來。另一方面，故事也被賦予新的寓意。對清廷自道光年以來「讓釁」外交與洋務運動不滿的官紳士民，將自身對中西關係發展的悲觀看法寄寓其中。下面就此三種書籍，討論七個與〈偷頭記〉直接相關印本的印刷與流通情況，指出相關個人輯錄並「移植」〈偷頭記〉的旨趣。

（一）沈鎔經

《中西紀事》本由著者當塗人夏燮（1800–1875）（署名「江上蹇叟」）在江西官廨刊刻，作者根據親身經歷及見聞，以紀事本末體的形式講述了兩次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外交觸史，是一種比較流行的早期鴉片戰爭史書。此書今存最早刻本為同治七年江西官廨刊本，⁶²卷首有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原序、咸豐九年（1859）九月次序，目錄後有同治四年（1865）六月序，書前鐫「歲在著雍執徐易月」一行。⁶³而之後出現的三個活字本，則都多出一篇「雪中人」所撰寫的後序，並由他自作主張地將〈偷頭記〉附錄於全書之後。「雪中人」明言此書曾遭到某大吏燬板，他以個人藏本重新用活字擺印。這三個木活字本依次是：

⁶² 儘管有很多人稱存在同治四年（1865）刊本，但筆者目前尚未見到傳本實物。

⁶³ 〔清〕夏燮，《中西紀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影印同治七年刻本），冊 402。

1. 光緒七年（1881）慧香籀木活字本。半葉 10 行 18 字。卷二十四下最後依次附有〈中西紀事後序〉、〈附錄偷頭記〉兩篇，為原刻所無。鐫牌記「辛巳春仲用活板印於慧香籀」兩行。由文字比勘可知，此書所收〈偷頭記〉應係從《煙嶼樓文集》中刪去首尾照錄。⁶⁴
2. 光緒十年（1884）江上草堂重排木活字本。版式、活字字體及所收文本，悉同慧香籀本。卷前有「甲申孟春月用活字版重印於江上草堂」兩行，為「霽中人」用同一套活字重新擺印無疑。⁶⁵
3. 光緒十三年（1887）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鐫牌記「丁亥年孟春活字版排印」兩行。版式與前兩種有較大區別，但卷末也附〈中西紀事後序〉及〈偷頭記〉，只是〈偷頭記〉內多把「夷」字改作「洋」字。⁶⁶《申報》曾登廣告售賣此書，稱「知足軒主人」委託申報館以鉛活字代為排印，由申昌書畫室經理發行，今日可見傳本尚多，應為《中西紀事》活字本中最流行的版本。⁶⁷

《中西紀事》此後的印本不再附錄〈偷頭記〉。而「霽中人」到底為何人，以往研究未有確說。⁶⁸考民國抄本《當塗縣志》之〈民政志〉：「沈鎔經，字芸閣，浙江烏程人，戊辰進士……及守太平，訪刻夏燮甫《中西紀事》、《謫仙樓楹聯》諸書。」⁶⁹時官安徽歙縣知縣的譚獻光緒八年（1882）正月日記云：「沈芸閣太守同年以活字本《中西紀事》見貽，為當塗夏燮父撰。……芸閣

⁶⁴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七年慧香籀木活字本），谷歌圖書掃描自哥倫比亞大學藏本（著錄誤作同治四年刻本），見：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d=oRs_cFnmJvMC&hl=zh-CN&source=gbs_book_other_versions（2023年5月31日檢索）。

⁶⁵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年江上草堂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018775。

⁶⁶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569556。以下引用之光緒十三年版本，皆引上海圖書館藏版本，不另註明。

⁶⁷ 〈《中西紀事》出售〉，《申報》，1887年4月21日，第1版。

⁶⁸ 一說認為由紹興人平步青排印。見張桂麗，〈夏燮年表〉，收入牛繼清主編，《安徽文獻研究集刊》（合肥：黃山書社，2014），卷6，頁128。

⁶⁹ 魯式穀等纂修，民國《當塗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安徽省圖書館藏鈔本），冊39，頁147。

後序流涕而道，恐折足之鼎所不願聞。讀既卒，唾壺盡缺矣。」⁷⁰則知〈後序〉為沈鎔經所撰寫，書籍亦由他主持擺印。

圖 1 《中西紀事》的三個活字版本



圖片來源：「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ttp://rbsc.calis.edu.cn>（2023年5月31日檢索）。由左至右：1881年慧香移木活字本、1884年江上草堂重排木活字本、1887年申報館鉛活字巾箱本。

現查沈鎔經（1834–1885）字雪仲（拆分即為「雪中人」），號芸閣，室號慧香室（〈中西紀事後序〉末云「敘於慧香閒移」），同治七年（1868）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光緒三年（1877）以大計保薦卓異，授安徽太平府知府，八年補安慶府知府，九年補安徽安廬滁和道，同年即遷廣東按察使。1883年翁同龢見過他後，在日記中稱其「樸實精明，真幹吏也」。⁷¹夏燮長沈氏34歲，故〈後序〉稱「僕叨居小友」、「訂忘年之交」；兩人同樣長期在江西做縣官，故稱「又屬同官」。而鑒於〈後序〉說：「每當酒酣耳熱，憤極悲來，拍案一呼，唾壺立碎」，以及自己「間陳管見，偶贅芻言，未嘗不誇薄縞可紉

⁷⁰ 譚獻著，范旭倫、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14。兩人皆在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中舉，故稱「同年」。

⁷¹ 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卷4，頁1820。

龍袞之華，曲鍼可備魚吞之用」來看，⁷²兩人頗有私交，且對時事的見解比較接近。由上大致可以推論，1875 年夏燮去世後，其書雖遭燬板，但時在太平府知府任的沈鎔經藏有夏氏舊刊本，「行篋收藏，僅餘數冊」，於是他「買紙鈔寫，欲貴三都，爰槧聚珍，以廣傳布」，⁷³是即 1881 年慧香移本《中西紀事》。1884 年仍由他在赴粵履任前，於安慶府「江上草堂」（應為其臨時寓所）重新擺印。至 1887 年，沈已過世，「知足軒主人」（名姓無考）假稱自己「得其原本」，實則以沈鎔經排印本寄交申報館代印。⁷⁴

沈鎔經跋〈偷頭記〉稱：

此四明徐柳泉（原註：時棟）舍人所撰也，錄之以見薄海公憤，即備宗、李波堪效指臂之助，酋不足平矣。爾時羊頭關侯，織兒榮之，君子猶差與齒。今則海上逐臭，執鞭欣慕，詭遇者據要津，躁進者趨捷徑焉。吁！是為偷之尤而並偷之不若者也。冠履倒置，愈趨愈下，可勝慨哉！書中人識。⁷⁵

即是說，道光年英國人「入寇」，下至盜賊尚知有所作為（「薄海公憤」），但即便是「劇賊」如徐保者（備宗、李波均為古代勢力強大的盜賊集團）願意效力抵抗，最後仍以在江寧求和告終（「酋不足平」）。那時出身卑賤者仍可憑擒殺英人易得高位（指〈偷頭記〉所謂「以五六品冠帶榮里中」，此用《後漢書·劉玄傳》「爛羊頭，關內侯」典），小人以此為榮，士紳如徐時棟也還算認可他們（「猶差與齒」）。時下則以侍奉洋人為榮（「海上逐臭」、「執鞭欣慕」），許多人不由考試的正途仕進，而因辦理洋務被保薦或報捐，晉

⁷²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冊 8，〈中西紀事後序〉，葉 2a。

⁷³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冊 8，〈中西紀事後序〉，葉 3b。他另著有《慧香室叢稿》，已佚。[清]沈鎔經，《慧香室集》（光緒二十二年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726，〈跋〉，頁 400 下。《慧香室集》為他人在沈氏去世後為其編刊的詩集。

⁷⁴ 〈《中西紀事》出售〉，《申報》，1887 年 4 月 21 日，第 1 版。

⁷⁵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冊 8，〈附錄〉，葉 2b。

升高位（「詭遇者據要津」）。這一頗有「清流」作派的評論，⁷⁶被作者在〈後序〉中進一步引申：

今夫中興之規，非不閱也；海防之備，非不預也。輪飛入楫，砲擊連珠，我不弱於彼也。津沽之紆迴，圖淞之扼要，彼不敵於我也。眾寡之勢，勞逸之形，直壯曲老之謀，主順客逆之理，固不煩再計決也。若猶一意遷延，受其要挾，恐汶陽之田未返，陳倉之道先通。暮楚朝秦，應接不暇，得隴望蜀，誅求無時。相率效尤，聞風踵至。毒早成於附骨，害更甚於養癰，可欺而欺，當斷不斷。苟自強之有策，和亦無損於國威；但示弱以要盟，禍恐即伏於事後。蓋病迫腠理，而始服消散之方，水決隄防，而徐議捍救之策，晚矣！惟冀乾綱速斷，勝算獨操，用張撻伐之威，一激忠義之氣。⁷⁷

沈鎔經並未全然否定洋務運動已取得的成績，但他認為調整目前中外關係的出路並不在此。更急迫的是朝廷需改變素來「要盟請和」的積習，在中外衝突之際要不憚用兵。總體來看，此後序延續了夏燮的著書旨趣，批評辦理洋務及外交者，傳達出對新式中西關係的不信任與危機感。但是 1887 年申報館排印此書時，則有意淡化這種警惕性和敵意。在鉛活字本中，「夷」、「酋」字均改為「洋人」和（洋）「官」，避免使用歧視性的稱謂，在〈偷頭記〉中又刪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一句。且自從鉛印本《中西紀事》發行後，《申報》長期刊印其售書廣告，直至 1905 年《申報》改革而停止。最初的新書廣告一般作：

是書為江上蹇叟所著，皆敘中西交涉事宜，溯自道光季年西人取道東來，初則脅以兵威，繼則敦夫和好，歷數十年之久，始得合中外為一

⁷⁶ 石泉（劉適），《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 10。

⁷⁷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冊 8，〈中西紀事後序〉，葉 2b-3a。「津沽」、「圖淞」，天津、大沽、圖山關與吳淞口，均為海防要地。

家，誠千古以來未有之創局也。蹇叟身居戎幕，目擊情形，因一一筆之於書，以成信史。⁷⁸

僅憑這個廣告，讀者或許以為《中西紀事》講述的是中西關係由對立走向和平共處的歷史，然而原排印者沈鎔經所理解的該書旨趣，實則完全相反：

臥榻之旁，竟有他人鼾睡；光天之下，公然魑魅橫行。褻我封圻，隳我藩衛，已揖開門之盜，猶歧築室之謀。陰拱而觀，倉皇失措；償贖竭澤，互市漏卮。陽託和戎，陰同讓釁。實昧抽薪之計，早貽伏莽之戎。此華洋之變局，亦千古之創局也。⁷⁹

言下之意，即把一切已訂中西條約視作列強的單方陰謀。然而即使申報館有意淡化此書的特定政治傾向，在甲午以後的焦灼情境裡，孔廣德讀到申報館代印的《中西紀事》時，仍然為〈偷頭記〉所打動，並與沈鎔經、譚獻等地方官一樣，從這個動員群眾的方案中，聯想到中西關係的灰暗未來與不可避免的衝突。

（二）陳康祺

名義上曾預修「同治志」的鄞縣進士陳康祺，在己著《壬癸藏札記》中，也從自己「壬癸藏」藏書中輯錄了徐時棟（陳稱其為「吾師」）《煙嶼樓文集》中的〈偷頭記〉，並在首尾附錄自己的評語。⁸⁰《壬癸藏札記》，又名《郎潛紀聞三筆》，其初刊本流傳極少。現查晚清民國時期共印有如下兩種：

⁷⁸ 〈《中西紀事》出售〉，《申報》，1887年4月21日，第1版。

⁷⁹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冊8，〈中西紀事後序〉，葉1a-1b。「臥榻之旁」蓋指一般在城廂外的租界，「魑魅橫行」蓋指城中華洋混居（原不准入城），「償贖」指條約賠款，「互市漏卮」指五口通商中鴉片貿易造成白銀外流，此為鴉片戰爭前後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的說法。

⁸⁰ 陳康祺自1881年調補江陰知縣後，因與江蘇學政黃體芳、兩江總督曾國荃齟齬，罷職去官，寄居蘇州，「建別墅曰滄園，儲藏萬卷，寢饋其間，將以其身為寓公焉」。此時所著各書，總名為「舊雨草堂叢書」。所謂「壬癸藏」，即陳氏自改官江蘇後所聚藏書，可能以國朝人著作為大宗。〔清〕董沛，《正誼堂文集》（影印光緒二十七年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707，卷4，〈陳鈞堂五十壽序〉，頁438下；〔清〕陳康祺著，張壽鏞編次，《鄉諺證古》（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985010：4，〈鄞縣陳鈞堂先生墓表〉，葉1a-1b；駱兆平，《天一閣雜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舊雨草堂藏書小考〉，頁89-91。

1. 光緒十一年（1885）蘇州家刻本《壬癸藏札記》。12卷，書名由潘祖蔭書，牌記鐫「光緒旃蒙作噩吳下開雕」，目錄後鐫「舊雨草堂叢書第八」，10行21字。有張文虎序，由陳氏子侄校字。⁸¹
2. 宣統二年（1910）掃葉山房石印本《郎潛紀聞三筆》。6卷，書名由澹廬居士陳震題。14行28字。有張文虎序，刪去校字人名。為三筆合印本之一。⁸²

後一種曾在《時報》及《申報》刊登廣告。《時報》廣告稱：

鄞縣陳康祺以高材擢甲科，浮沉郎署，載籍極博，嘗裒集國初以來朝廷政要、搢紳事略、名人言行與夫治術之得失、世故之變遷，擇焉必精，間加論斷，計成《郎潛紀聞》二十餘卷。其《初筆》、《二筆》，久經刊布，才人學子，幾於家置一編。惟《三筆》當時雖曾付刊，然只印數十部，分贈知交，從未發售，以故海內流傳絕少。本坊向藏書家覓得《三筆》初印原本，合之《初》、《二筆》彙印成編，並請名人逐條增補目錄，卷首復列總目，俾閱者便於檢查。書凡十冊，印以潔白連四紙，定價洋二元五角，有欲研究本朝掌故者，請臨本坊及各書坊購取可也。此佈。蘇申南北掃葉山房啟。⁸³

相比光緒間初刻本《壬癸藏札記》，⁸⁴掃葉山房石印本《郎潛紀聞三筆》憑藉其在蘇州及上海的南北分號經銷，對傳播〈偷頭記〉有更大的功勞。後來遍見於報紙副張、筆記、小說和《清朝野史大觀》、《清代吏治叢談》等野史

⁸¹ [清]陳康祺，《壬癸藏札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影印光緒十一年蘇州家刻本），冊554。

⁸²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663053（2）。

⁸³ 〈《郎潛紀聞初二三筆》出書廣告〉，《時報》，1910年8月1日，第4版。粗體表示原文用醒目大字排印。

⁸⁴ 譚獻和皮錫瑞都曾讀到此刻本。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頁334；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皮錫瑞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冊2，頁622。

讀物中的〈偷頭記〉，⁸⁵依照文字比對看來，就多是從掃葉山房石印本《郎潛紀聞三筆》轉引而來的。

在《三筆》的〈偷頭記〉一條下，陳氏刪去原記首尾奧澀的引語和贊語，加入自己的見聞，從而形成一個主角鮮明、情節生動且更便閱讀的完整故事。末曰：

康祺按：先生所述，吾鄉人皆能言之。以余所聞，定海之役，葛、鄭諸公之忠骸，亦由群偷竊以回營。偷並於甬江中置小艇，伺西人出，狙擊之，所俘獲亦不少。前法以靜制動，此法以動擾靜，偏謀詭計，當為洞曉邊事者所鄙夷。然而水陸異形，地學不講，南北畫界，事權不專，武夫狃前功而驕，書生守成法而泥，舟車器械，師其貌而遺其神，玉帛兵戈，決於朝而更於夕。杞人之憂，耿耿在臆，不得已而錄此下策，姑備蕘詢，其亦可流涕長太息矣。⁸⁶

劃線處連同此則筆記開頭所述群偷姓名、人數（徐保、張小火與「其黨六十人」），無疑都以「同治志」的考證為根據。可見無論他是否實際預修《鄞縣志》，但都讀過纂成之本。陳氏雖稱群偷的行動為「偏謀詭計」，但關懷卻不在此處。他實欲借題發揮，批評時下洋務運動徒學皮毛（「舟車器械」句）、外交遊移不定（「玉帛兵戈」句）及南北洋通商大臣制度之不合理（「南北畫界」與「事權不專」）。

⁸⁵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4，〈徐時棟《偷頭記》〉，頁13-14；伍承喬編，《清代吏治叢談》（杭州：浙江警察協會，1936），卷3，〈徐時棟《偷頭記》〉，頁43-44。《清朝野史大觀》、《清代吏治叢談》較陳康祺的轉述改字較少，大體只是將「吾師徐先生時棟集中」刪去「吾師」兩字、又隱沒「刪節錄存，非欲翹將軍、參贊之過也」一句及末尾陳康祺的一段按語。《清稗類鈔》收錄的〈偷頭記〉來源較難分辨。徐珂編撰，《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冊6，〈中英鴉片之戰〉，頁94-96。《清朝野史大觀》及《清稗類鈔》之娛樂性自不待言，而《清代吏治叢談》之售書廣告雖云該書欲「以貢獻於當世之為官吏者作為借鏡」，但也講此書「消遣家不可不備」，「本編蒐集官場怪狀，詼諧百出，足以解頤」。浙江省警察協會啓，〈《清代吏治叢談》〉，《中央警官學校校刊》，卷1號2（1936年11月），頁262。

⁸⁶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冊，〈徐時棟《偷頭記》〉，頁738。按：整理本末句「姑備蕘詢」，係底本即如此，疑應為「備」。引文下劃線為筆者所加。

不同讀者對《郎潛紀聞》的觀感各異。譚獻初讀《初筆》、《二筆》時，尚頗有微詞，批評其作者「標高販己」，但讀到《三筆》時，卻又覺得該書「頗有益於掌故之學」；劉承幹讀到《三筆》，則直言不甚欣賞這類「掌故之學」，後者稱：「觀其所記各事，關乎經國者，殊亦不多，而瑣瑣雜事中亦復煩冗異常，斷制既乏謹嚴，載記亦甚平率，甚無謂也。」⁸⁷然而，此書之價值雖在士紳眼中較有爭議，它卻實在地把〈偷頭記〉傳播到一般書籍市場與大眾讀物之中。由此石印本流傳開的〈偷頭記〉，則演變成面向一般讀者的消閒讀物，而不再只是有經世之用的掌故。

（三）孔廣德

孔廣德在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後自輯且自費出版的《普天忠憤集》，是另一種輯錄了〈偷頭記〉的書籍。此書欲求反映求和以後官紳士民各群體的「忠憤」，輯錄時人所作篇章，各書局皆有印本，現可見兩種上海的袖珍石印本：

1. 光緒二十一年（1895）賜書堂石印本。14 卷，12 冊，牌記葉鐫「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孟冬校印」，旁有「匡時讜論嗣出」一行。書由孔廣德委託上海四馬路南書錦里賜書堂代印。此書在《申報》、《新聞報》上有售書廣告。⁸⁸
2. 光緒二十四年（1898）經濟書局石印本。14 卷，10 冊，牌記鐫「光緒戊戌仲秋經濟書莊石印」。行款較前一種更緊湊，取消了抬格，且刪節部分文本，以求節省篇幅。卷九末〈附錄中西紀事所載偷頭記〉

⁸⁷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頁 273、334；劉承幹著，陳誼整理，《嘉業堂藏書日記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上冊，頁 9。劉承幹讀到的是購自掃葉山房的石印本。

⁸⁸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影印光緒二十一年賜書堂石印本），冊 226-228。下文若無特別說明，所引皆指此本。又見谷歌圖書掃描自哈佛大學藏本，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about/%E6%99%AE%E5%A4%A9%E5%BF%A0%E6%86%A4%E9%9B%86.html?id=IEMrAAAAYAAJ&redir_esc=y（2023 年 6 月 2 日檢索）。由孔廣德在滬上發行量最大的《申報》及《新聞報》發布的廣告（見於 1896 年至 1898 年）得知，此書在滬上由賜書堂書莊代售，外埠亦交京師、天津、漢口、蘇州、杭州、鎮江各書莊代售。

中將「既而獻頭者紛若」以下有關偷頭情形的文字刪略，直接「乃屬登舟而去之」句。⁸⁹

編輯者孔廣德生平事蹟無考，但他既在書中自稱「曲阜莊客魯陽生」、「市井臣魯陽生」、「曲阜魯陽生孔氏」，則應無功名官職，且本人在士林中並不知名。孔書中多採納四川舉人張羅澄（時以痛詆李鴻章聞名）的言論，而張氏曾致函汪康年云：

有坊友采輯《普天忠憤續集》，託弟共襄其事，其式仍前，以詩賦殿後。弟商之坊友，以為詩賦無裨實用，欲採貴館所售天學歌、地學歌、新樂府及馬中丞蠶桑歌，彙刻以代詩賦，庶於實學有益。坊友恐翻刻有礙，故特奉達。⁹⁰

據此，孔廣德很可能是上海的書坊中人（即張所謂「坊友」），「曲阜孔氏」應為他攀附的郡望，「魯陽生」則為應時應景的自號（取「魯陽揮戈」意）。據他在《新聞報》上刊登的售書告白，他力推此編為「當今談洋務者第一全書」，且「是書由余采輯交上海賜書堂印售，費用不貲，故稟明存案，三年內不許人翻板，如在三年內翻板者，照例充公」。⁹¹而時隔三年，經濟書局就壓縮此書卷帙，將其石印再版。

孔廣德與張羅澄都把自己對〈偷頭記〉的看法寫下來，附同原記刊布在《普天忠憤集》中。張羅澄跋語云（原載氏著《劍映錄》，已佚）：

術之賤至為偷，人之賤至為偷兒，而能以其偷為國殺賊，則遂不敢以偷兒賤之。莊生曼衍，謂仁勇信義，盜亦有道，蓋以偷兒愧當世也。今天下之言曰：「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夫官於平日剝民自奉，則甘為偷兒；一遇變故，則不能如偷兒之殺賊，此「三手四腳」之所

⁸⁹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光緒二十四年經濟書莊石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510022，卷9，〈附錄中西紀事所載偷頭記〉，葉25a。

⁹⁰ 《普天忠憤續集》或即《匡時讜論》，未見刊本。張羅澄，〈張羅澄致汪康年（二）〉，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冊2，頁1644。

⁹¹ 魯陽生，〈寄售新出時務第一全書託上海賜書堂書莊代售〉，《新聞報》，1896年11月1日，第1版。

以稱也。視此偷兒，寧不愧死乎？舊讀《十國春秋》，杜育為盜，母笞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不使他人砍頭。」然則以偷習膽，遂能殺賊立功，殆亦豪俠之流亞歟！今讀〈偷頭記〉，特書數語於後，所以警為民牧而忍為偷兒者，亦所以勉偷兒而卒成國士。至若亂世需才，操用人之柄者，義可不必以尺寸繩矣。⁹²所言直白露布，一面表彰盜賊許國，另一面諷刺時下文武官員的畏葸與貪汙，但也略顯浮泛。而在甲午年後，孔廣德讀到張羅澄跋，又從 1887 年鉛活字本《中西紀事》中讀到〈偷頭記〉原文，⁹³決定並加刊布。他附記稱：

前於張孝廉《劍吹錄》中讀其〈偷頭記書後〉一篇，以為有激之言也，今於《中西紀事》得睹〈偷頭記〉始末，乃知張君所表彰之意。蓋因中外多故，苟用其術，可以殺賊，亦猶藥石之不廢牛溲也。茲故附錄於此，留為高朋採擇。⁹⁴

較之張羅澄跋中的游離高論，孔廣德想法更近陳康祺，也視該故事為未來中西產生衝突時一個不得已的最後方案，故比盜賊於「牛溲」。不過孔廣德在當時上海流行刻印時務書籍的背景之下，在三個月內便完成輯錄，並擲下巨資印刷此編，⁹⁵又以「洋務第一全書」自詡，也有投時人所好從而賣書射利的心思，並非只為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⁹⁶

上述三種輯錄〈偷頭記〉書籍的七個版本中，1887 年由申報館代印的鉛活字袖珍本《中西紀事》與 1895 年由賜書堂代印的石印袖珍本《普天忠憤集》應屬流通較廣的版本，今日存本尚多，且原即由專門書坊代售，外埠也可購得。

⁹²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228，卷 9，〈蜀人張羅澄跋〉，頁 491-492。

⁹³ 孔廣德輯錄的〈偷頭記〉無疑是 1887 年鉛活字本，因其改「夷」為「洋」字，而慧香移或江上草堂木活字本皆未改用對等稱呼，一仍舊刻。

⁹⁴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228，卷 9，〈蜀人張羅澄跋〉，頁 492。

⁹⁵ 自述「是書費三月心血」，但也強調「非同書肆中湊積陳腐言，漫無棄取，倉猝成編也。」[清]孔廣德，《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226，〈凡例十二則〉，葉 7a。

⁹⁶ 皮錫瑞曾指出其選錄未能盡善的問題，見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皮錫瑞日記》，冊 2，頁 506。

而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三筆》在 1910 年經掃葉山房改為石印發行後，影響更為深遠，民國初年與 1930 年代各類大眾讀物，便經常從《郎潛紀聞三筆》轉述〈偷頭記〉。餘下四個版本，或因經過刪略，或因已刊而未發行，或因印量較少且沒有專門的分銷網絡，流通有限。

總之，在清末甲午以後的十數年間，以崛起的上海書業為主要渠道，〈偷頭記〉逐漸脫離《煙嶼樓文集》而獨立，「寄生」到其它書籍（尤其是《郎潛紀聞三筆》），經更複雜的印刷及售書網絡廣為傳播，有關印本則成為後來時代轉述〈偷頭記〉的新源頭。《煙嶼樓文集》雖從未再版，〈偷頭記〉卻被輯錄入其它流行書籍，從而跨地域、跨書籍地流通，讓一則地方傳說文本「藉附以傳」。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輯錄〈偷頭記〉的編者或印刷者也賦予了文本新的寓意。這個故事不再勾起時人對過去鴉片戰爭的記憶，而是使得他們聯想到當下和未來。輯印者們對中西關係的發展抱有矛盾的看法，雖然承認走向世界帶來的變化，但更多的是對中西新的相處模式持有懷疑，表達出很深的危機感。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則使得這種危機感加劇。儘管他們把動員群眾抵抗視為應對最終中西衝突的方案，但對此方案成效的預計，其實也並不樂觀。

五、「黑水黨」的「反帝鬥爭」： 大眾讀物、史料叢刊與〈偷頭記〉的寓意改造（1915–1957）

「藥石之不廢牛溲」，⁹⁷「偏謀詭計，當為洞曉邊事者所鄙夷」，⁹⁸這些對故事主角的成見與對利用盜賊策略的批評、質疑，是晚清輯錄〈偷頭記〉的士紳一致的態度，唯有張羅澄獨持異議。而民國以後，1930 年代在《大公報》

⁹⁷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228，卷 9，〈蜀人張羅澄跋〉，頁 492。

⁹⁸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冊，〈徐時棟《偷頭記》〉，頁 738。

副刊撰稿不輟的有名掌故家徐凌霄、徐一士仍然還說，「將軍大員，無術制敵，而乞靈於此種狡獪伎倆，縱偶效，亦無關全局之勝負」。⁹⁹可見「偷頭」事蹟不僅原初未被片面歌頌，後來的輯錄者也還沒有拔高盜賊的形象，實則常常以故事為話頭，轉而抒發對洋務運動及外交政策的不滿。轉錄時對「偷頭」的恐怖行為和「偷兒」的原本身分，也不諱談。

但當晚清新式傳播媒介出現並普及後，政黨、學人、報人與地方菁英積極通過報紙、雜誌等書籍以外的新印刷品傳播思想與主義，啓蒙大眾，¹⁰⁰在特殊的情勢之下，乃至嘗試改造國民歷史記憶，借古諷今，塑造特定的歷史認識，從而發動或爭取群眾。¹⁰¹在此背景下，〈偷頭記〉屢經重印、改寫，也常常是出於古為今用的目的，服務於急迫的動員與宣傳需要。當抗日戰爭落下帷幕，黑水黨故事的寓意已被徹底改造。昔日的竊賊，搖身變為「義盜」與「黑水黨」，徐保則成了可敬可愛的民族英雄，百年前的細節竟還在浮出水面。下面討論從民初至 1950 年代，〈偷頭記〉的眾多衍生文本背後不同的輯印旨趣，並勾勒故事形態變化與寓意改造的大致過程。

（一）報紙副刊、雜誌等大眾讀物中的〈偷頭記〉

報學史家戈公振曾稱，自民初各報館興辦副刊以後，有知識的讀者「舍讀日報副張以調節其腦筋外，幾別無娛樂之可言」。¹⁰²而各報館接收的副刊投稿

⁹⁹ 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澤昱編輯，劉悅斌、韓策校訂，《凌霄一士隨筆》，中冊，頁 867。

¹⁰⁰ 如 1895 至 1912 年間，以《申報》與《時務報》為代表的新式中文報刊如何試驗出成功的商業報及機關報模式，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庚子以後的十年間，趨新學人、報人與政治人物如何通過白話報、創辦閱報社及宣講所來啓蒙下層社會，號召合群、戒纏足、抵制外貨、募捐、講解新政及革命，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而從接收端考察清末民初的啓蒙進程如何陷入泥沼，並被誤讀與利用，見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清末民國的中文報紙同仁刊多於職業報、新聞不如政論、主筆地位高於訪員、專業主義讓位於現實政治討論等問題的分析，見李金銓主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¹⁰¹ 蔡炯昊，〈抗戰期間的晚明歷史記憶與政治現實——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編作品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87-104。

¹⁰²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89。

中，談掌故者更不在少數。〈偷頭記〉篇幅短小，事件的戲劇性強，正符合副刊的版面標準及讀者口味。故而《申報》副刊〈自由談〉、天津《益世報》副刊〈益智綜〉及北京《益世報》副刊〈益世俱樂部〉，都曾原文轉載〈偷頭記〉，¹⁰³不加批語，大概就只是供士紳讀者消閒，引為議論之資。其中《申報》登載的〈偷頭記〉（係從徐氏原文引錄）後來亦被編入小說《南北奇俠傳》中。¹⁰⁴青浦人陸士諤（1878–1944）在《神州日報》連載的章回體小說《清史演義》，也將這個故事收入其中。¹⁰⁵這些副刊與小說刊載〈偷頭記〉，是當時文學消費市場的常態，不見有強烈的政治寓意。

九一八事變後，出版物中的〈偷頭記〉獲得全新政治含意。在民眾、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國、共兩黨共同號召抗日救亡的局面之下，許多官私報紙與雜誌再次找出這一則傳說，以白話改寫原來的故事文本，有選擇地深描部分情節，期望以此激起國民的抗爭心。鄞縣桃江小學教員編訂的讀物《寧波的民族英雄》、¹⁰⁶鄞縣女中校刊《竹洲》、¹⁰⁷浙江省教育廳主辦的《浙江青年》、¹⁰⁸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主辦的《老百姓》雜誌、¹⁰⁹上海兒童書局的《兒童雜誌》、¹¹⁰濟南的農村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報》、¹¹¹國民黨機關報《東南日報》、

¹⁰³ 劍秋述，〈偷頭記〉，《申報》，1915年3月13日，第14版；一介，〈偷頭記〉，天津《益世報》，1927年4月16日，第16版；一介，〈偷頭記〉，北京《益世報》，1927年4月8日，第8版。

¹⁰⁴ 姜俠魂編纂，《南北奇俠傳》（上海：新華書局，1926），冊2，頁24-27。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511&fid=027032013020476（2023年12月11日檢索）。

¹⁰⁵ 陸士諤著，劉大軍、喻爽爽、宋朝儀校點，《清史演義》（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下冊，頁667-669。

¹⁰⁶ 楊靜著，吳文欽校，〈黑水黨〉，《寧波的民族英雄》（寧波：桃江小學，1937），上冊，頁72-76。

¹⁰⁷ 刁作伊，〈偷頭（一）〉，《竹洲》，期2（1932），頁117-118；張連英，〈偷頭（二）〉，《竹洲》，期2（1932），頁118-119。

¹⁰⁸ 王純卿，〈打退英兵的黑水黨〉，《浙江青年》，卷3期3（1937年1月），頁1-2。

¹⁰⁹ 〈小偷立大功：傳說中的寧波偷頭故事〉，《老百姓》（浙江金華），期61（1940），頁16-17。

¹¹⁰ 鄒筆暇，〈奪回寧波的徐保〉，《兒童雜誌》，新期20（1937年5月），頁56-57。

¹¹¹ 〈海盜徐保〉，《田家半月報》，卷4期14（1937年7月），頁17。

《南寧民國日報》、《陣中日報》皆曾將〈偷頭記〉轉寫為白話文登載。¹¹²蘇州的《鬥報》、¹¹³太原的《山西國術體育旬刊》則根據《普天忠憤集》轉錄〈偷頭記〉原文。¹¹⁴此時在通俗讀物中刊載〈偷頭記〉，一般不指明出處，且多經轉述者改造。經轉述見刊者有以下共同特點：其一，「偷頭」情節避而不談，以籠統的「抵抗」或「游擊戰」代替；其二，雖然徐時棟原未提及「徐保」其人，但這時徐保已成為絕對的故事主角，並且儘管徐保有時仍被稱為「海盜」，但多數轉述者選用不含貶義的「黑水黨」稱呼乃至擬定題目；其三，轉述時只論徐保等人的功績，不提劣跡，浪漫化地稱其為「梁山泊人馬」，有時乃至表彰為「民族英雄」；其四，從受眾年齡和地域看，故事現在擁有極廣的讀者，全面超越通過書籍傳播時期的受眾範圍。其文字亦較從前生動易讀，便於大眾接受。

此時也出現了故事的配圖。不過，《老百姓》雜誌的配圖顯得缺乏現實感（見圖 2），《田家半月報》則似乎盜印了上海《兒童雜誌》的配圖（見圖 3）。這些配圖大都不甚講求工緻。

自民初以來，亦有數種根據〈偷頭記〉再創作的文學作品。1915 年「守如」發表於《小說海》的改編短篇小說〈偷頭復城記〉別具用心，自稱欲藉故事「激發國恥觀念。此後國民幸各發憤自強，謀正當之防衛，毋使外交汙點長留於史乘」，¹¹⁵不為主人公「賽時遷」（江蘇吳縣人鄭阿雄，即以徐保為原型構想的人物）美言，直說「先是寧波有積竊曰賽時遷者，身手敏捷，積案纍纍，官中捕之數年，迄未能獲」，最後藉虛構的結局指出匪類之不可用。蘇州人顧明道（1897–1944）在《新聞報》上發表的〈虎嘯龍吟錄〉，也將〈偷頭記〉

¹¹² 陳立業，〈黑水黨〉，《東南日報》，1940 年 5 月 18 日，第 4 版；趙伯伊，〈偷頭記：鴉片戰爭野史〉，《南寧民國日報》，1935 年 12 月 5、6 日，第 10 版；少棠，〈黑水黨（小小說）〉，《陣中日報》，1940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

¹¹³ 國花，〈偷頭記〉，《鬥報》，卷 2 期 24（1932 年 10 月），頁 8。轉錄者「國花」意在藉此批評「胡立夫輩漢奸」。

¹¹⁴ 四明徐時棟柳泉，〈義盜偷頭記〉，《山西國術體育旬刊》，卷 1 期 30（1935 年 6 月），頁 6-7。

¹¹⁵ 守如，〈偷頭復城記〉，《小說海》，卷 1 號 9（1915 年 9 月），頁 4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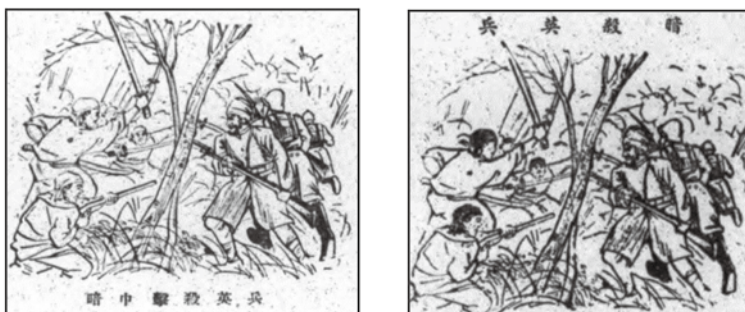
改編，轉以葛雲飛和徐保爲主角。¹¹⁶奉化人莊景仲（號「求我山人」）所著《黑水黨抗英紀聞》（抄本未刊）係忠於原文本的改編，¹¹⁷故事極力推崇徐保，一面表達抗戰時期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不滿，另一面也折射著轉述者的個人心路。故事中美化下層人物，強調其抵抗侵略、反對「投降派」政府的左派思想，與莊景仲在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思想逐漸左傾，退出國民政府並暗中支持中共活動的背景不無關聯。¹¹⁸

圖 2 《老百姓》雜誌配圖



資料來源：〈小偷立大功：傳說中的寧波偷頭故事〉配圖，《老百姓》，期 61（1940）。

圖 3 《兒童雜誌》與《田家半月報》配圖



左：〈奪回寧波的徐保〉配圖，《兒童雜誌》，新期 20（1937 年 5 月）。
右：〈海盜徐保〉配圖，《田家半月報》，卷 4 期 14（1937 年 7 月）。

¹¹⁶ 顧明道，〈虎嘯龍吟錄（三）〉，《新聞報》，1938 年 9 月 15 日，第 20 版；顧明道，〈虎嘯龍吟錄（四）〉，《新聞報》，1938 年 9 月 16 日，第 18 版。

¹¹⁷ 求我山人，〈黑水黨抗英紀聞〉，收入《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 373-376。

¹¹⁸ 有關莊景仲的生平，見林傑，〈求我山人和《黑水黨抗英紀聞》——與季文一同志商榷〉，《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4 期，頁 103-105。

（二）教科書與通史著作中的三元里與黑水黨鬥爭

報紙、雜誌雖然使得黑水黨的故事普及開來，但確立它在中國近代史通史敘述中的地位，則是一般大眾讀物難以實現的目標。在這一點上，1930年代後歷史教科書及通史著作書寫方式的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既有研究已指出，左派史學家自1930年代開始，即力圖重寫中國近代史，在抗戰背景下抨擊歷代政府的投降政策以影射時政，尤其注重批判以蔣廷黻（1895–1965）為代表的近代化史觀，並重新構造革命化的中國近代史敘事。¹¹⁹同時，鴉片戰爭的開端性地位，在1930年代後也逐漸成為史學共識，這一事件的書寫方式亦受到更多關注。¹²⁰但其中頗受忽視的一個面向，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到底如何揀選、刪汰或增補事例，讓人民群眾在史書中真正成為主角，並且同時凸顯「反帝」和「反封建」兩種鬥爭。這一節即討論民國以後的專著、通史著作和教科書中，三元里「平英團」和寧波黑水黨的事蹟如何被逐步邊緣化；而1930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何在構建革命的近代史敘事時，又讓二者重新成為鴉片戰爭的重要主角。

在魏源、夏燮和梁廷相等人創作的早期鴉片戰爭史書中，黑水黨的事蹟本來無人提及。然而1841年廣東三元里鄉民自發組織對遠征軍的武裝襲擊，與黑水黨活動的性質相近，卻是早期史書中相當重要的內容。¹²¹這些作者誇大這次抵抗的結果，或許與鴉片戰爭時期魏源等士人希望利用宣傳這一事件來為主戰派贏得支持有關。比如魏源就宣稱，若無官府的阻攔，三元里鄉勇的抵抗本

¹¹⁹ 李孝遷，〈革命與歷史：中國左派歷史讀物〉，《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5期，頁33-46；趙慶雲，〈范文瀾早期的近代史研究〉，《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29-35；謝輝元，〈一九四九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年第4期，頁102-112。

¹²⁰ 劉超，〈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學術月刊》，2007年第6期，頁146-153。

¹²¹ 學者們對這場被塑造為神話的抵抗事蹟，已提出不少質疑，並且基本形成學界共識。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第2版），頁15-17；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頁291-314。

可改變戰爭的結局，清廷則應鼓勵而非抑制類似的活動。¹²²由於早期史書對此事多有描述，在清末以後，三元里的事蹟仍然出現在一些頗有影響力的通史著作和教科書中。¹²³不過很多作者明顯不再刻意拔高三元里事件的意義與影響，而只將其視為戰爭經過中值得瞭解的一件大事。而這些新的史書中，仍然沒有黑水黨的一席之地。

在近代史學科化的進程中，於學院內接受過現代史學訓練的學者，尤其是蔣廷黻、陳恭祿（1900–1966）、郭廷以（1904–1975）、郭斌佳（1908–2004）、沈惟泰（1906–1973），重新撰寫了一批有關鴉片戰爭的專史或通史著作，改造了舊有著作對近代史的理解與書寫方式。¹²⁴他們對三元里和黑水黨的鬥爭絕口不提，是因為深信這種鬥爭的成敗並不影響近代史的整體發展。他們認為中國的出路不是對外戰爭，而是追求國際化與現代化，誇大過去的對外抵抗事件及成果，則有違背此二者的危險寓意。羅家倫（1897–1969）的話大概能代表他們的心聲：

又如三元里民團抵抗英兵這件事，是中國人最引以自豪，而史學家如魏源，也深為太息痛恨，以為可以挽回敗局的。以後這件事輾轉傳說，幾乎成為神話。中國在鴉片戰爭受了這種的鉅創深痛，事後還是不知發奮圖強，三元里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強，漢奸急於求和，我卻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紀的世界，還可以執挺〔挺〕以撻堅甲利兵。）¹²⁵

¹²²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7-175.

¹²³ 如桑原隲藏著，金為譯，《東洋史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第3版，卷4，頁81；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第2版），第三編，頁53；蕭一山，《清代通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中卷，頁887-888。

¹²⁴ Wei-Tai She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839-1860"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32); Ping-chia Kuo,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其餘幾部著作，將在後文中提及，此不贅。

¹²⁵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卷2期1（1931年3月），頁156。

在近代史中，他們覺得像琦善一樣認識到中西差距、力圖避免戰爭的外交家，而非虛驕、主戰的士大夫，才是值得尊敬的人物。¹²⁶爲此，他們改造鴉片戰爭的歷史形象，將其塑造爲一次慘痛的歷史教訓。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中就說，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理由」是中國的落伍，而失敗後仍不能及時改革，追求近代化，所以又「喪失二十年的光陰」。¹²⁷沈惟泰和陳恭祿都附和這一看法。¹²⁸這樣的歷史觀點，也與當時二戰背景下，他們認爲中國應該避免在對日問題上唱高調、「在國際生活中尋求出路」的時事觀點相呼應。¹²⁹總之，他們基於中國現實所構造的近代史框架，以及對近代化、國際化理念的追求，使得「平英團」和黑水黨領導的鬥爭在他們影響一時的著述中被完全邊緣化。

1930年代服務於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走上了改造近代史敘事的另一條道路。他們並不否認鴉片戰爭是中國的失敗，但全面否定戰爭中琦善等人的交涉與妥協，稱其爲「投降主義」，轉而強調林則徐和人民大眾抵抗、鬥爭的一面。與蔣廷黻等將這場戰爭完全視爲歷史教訓不同，他們認爲其中至少還出現了一個積極的因素，那就是人民群眾開始自發地（而不是受領導、被動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清政府），而這樣的抵抗最終將發展爲改變歷史的革命。

在這一背景下，在有關鴉片戰爭的敘述中，首先被重新發掘出來的就是三元里「平英團」的事蹟。李平心在最早系統運用唯物史觀的《中國近代史》（1933年初版）一書中，首先提出了鴉片戰爭時期廣東人民兩次反英鬥爭的說法（1841、1842年各一次），但最初附和者不多。只有其中被作者稱爲「中國民眾最初的自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平英團」，因爲歷史地位更特別，成爲同類著述沿襲的內容。¹³⁰張聞天、華崗、曹伯韓的近代史著作，都把三元

¹²⁶ 可參考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頁110-122。

¹²⁷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慶：青年書店，1939），頁18。

¹²⁸ 沈惟泰，《中英外交》（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24；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157。

¹²⁹ 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頁156。

¹³⁰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上海：光明書局，1935，第3版），頁27-29、31。

里事件列為當時人民自發性反帝鬥爭的典型。¹³¹1940 年代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影響最大的兩部中共史學著作，則延續並擴大「兩次鬥爭」的說法。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948 年初版）雖然敘述簡短，但也提到 1841 年和 1842 年有兩次人民自發的反帝運動；¹³²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1946 年初版）則用不少篇幅和史料來具體介紹這兩次「反英武裝鬥爭」，還列舉出福建、浙江、江蘇的相似事例作為補充。正是在范文瀾這部後來不斷再版的名著中，黑水黨的鬥爭才作為三元里事件的配角，極罕見地被一併提及。¹³³華崗在 1951 年修訂其舊著時，亦增補三元里之外的事例，提到「在浙江方面，當英軍侵佔定海、鎮海、寧波時，當地人民曾經組織黑水黨，狙擊敵人，可惜沒有記載當時鬥爭經過的史料留下來」。¹³⁴

「平英團」與黑水黨的事蹟雖然被重新發掘出來，滿足了構建革命歷史敘事的需要，但很多史學家恐怕都和華崗一樣，雖然認為黑水黨是不受領導的自發抵抗，但對其具體情形，則根本找不到可靠的史料來瞭解。如何擴充有關人民群眾的史料，也就成為這一時期中共史學工作的另一個重心。

（三）輯印史料叢刊運動與〈偷頭記〉

民國以來對中國近代史史料的整理與擴充，是黑水黨故事逐漸獲得歷史常識地位的另一重要背景。自 1931 年羅家倫首發要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口號後，¹³⁵受其影響，蔣廷黻、郭廷以與陳恭祿等近代史研究者皆把研究重心放在新史料的披露與考訂上，尤其加

¹³¹ 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延安：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1937），頁 10-11；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海：雞鳴書店，1940），卷 1，頁 50；曹伯韓，《中國近百年史十講》（桂林：華華書店，1942），頁 8。其中華崗的敘述基本是照抄李平心著作的內容。

¹³²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第 2 版），頁 8。

¹³³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上編，第一分冊，頁 63-68。

¹³⁴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卷 1，頁 130-131。

¹³⁵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卷 2 期 1，頁 148。

意於纂輯排印未刊的中外官方檔案及抄稿本「原料」。而當時左派史家群體中間則盛行好寫教本、相對輕視史料考證的風氣。¹³⁶

就鴉片戰爭史料而言，蔣廷黻依據故宮新發現的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抄本、大高殿軍機處檔案輯成之《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與《籌辦夷務始末補遺》，¹³⁷郭廷以自稱「史料選錄或類輯，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的《近代中國史》第二冊，¹³⁸皆直接響應羅的號召，郭著甚至直接將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這篇已發表文章挪作全書序言。¹³⁹受這一風氣影響的學者，大都不甚相信當時左派史家推崇的三元里神話。清人筆記及早期鴉片戰爭史書的價值，也受到這些史學家的嚴厲質疑。姚薇元（1905–1985）在清華完成的畢業論文〈鴉片戰爭史事考〉即力求逐句考訂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的誤失，¹⁴⁰而陳恭祿也曾批評《中西紀事》與筆記類著作不足信據。¹⁴¹他們對於《中西紀事》、《郎潛紀聞三筆》等舊時代士大夫著述中的〈偷頭記〉會有何種態度，也不難想見。

而 1940 年代以後，中共方面的史學家亦開始從事纂輯近代史史料的工作。相較郭、陳等，以范文瀾、阿英為代表的中共學者並不拘泥於史料的價值次序，特別注意發掘反映「人民反帝鬥爭」的各類資料。於是到 1946 年，阿英以《近代外禍史》為名輯印的十種稀見史料中，便選印徐珂《晚清禍亂稗

¹³⁶ 如李鼎聲稱：「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並不需要什麼考證工作，我們只是依據豐富可靠的史料加以說明與批判就夠了。」李鼎聲，《中國近代史》，頁 6。

¹³⁷ 〔清〕文慶等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平：故宮博物院，1929，影印本）；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上卷；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中卷；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全 9 冊。

¹³⁸ 郭廷以，〈例言〉，《近代中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第 2 版），冊 1，頁 1。

¹³⁹ 郭廷以，〈引論〉，《近代中國史》，冊 1，頁 1-26。

¹⁴⁰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貴陽：文通書局，1942）。

¹⁴¹ 如稱：「《中西紀事》《海防紀略》所言多為時俗之傳說，著者不知交涉之原委，戰爭之實狀，所言不合於實況，無待贅言。《中西紀事》論教士之取紅丸等，直為癡人說夢。」「筆記種類亦極繁夥，價值高下，亦如上論之書，大體而言，多不足信。其困難則執筆之文人，多無判斷真偽之能力，往往深信不可思議之傳說也。」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 7 版），下卷，頁 856-857。

史》，其中含有據《郎潛紀聞三筆》照錄的〈偷頭記〉。¹⁴²1957年，阿英又出版《鴉片戰爭文學集》，選刊了《普天忠憤集》和申報館叢書本《中西紀事》中相關的附本，並附錄《偷頭記》原文。¹⁴³有關輯印的理由，阿英特別稱：

這不但說明了當時人民的敵愾同仇，也可以見到在愛國活動的生活實踐中，思想意識以至於情緒的被改造。只是作者（筆者按：指徐時棟）為自己階級觀點所局限，始終以下賤的偷兒目之，遂不能充分的認識其成長。¹⁴⁴

「偷兒」是否成長，自史料中無從得知，但由此可見，輯印史料叢編無疑是建立革命的近代史敘述的重要補充，部分史料亦由此被賦予嶄新的寓意。從書信來看，阿英在1957年搜集到四百餘部「鴉片戰爭後詩文集」後，¹⁴⁵仍未鑿足，到1959年，單是此類別集便已得「近千種」。¹⁴⁶然而以創作革命戲劇聞名的阿英搜集此類材料，更多是為文藝工作而非歷史研究服務。¹⁴⁷故而《鴉片戰爭文學集》所收資料很多都未註明版本，他自己更曾明言，是否屬於「反帝的材料」，才是他的材料收錄原則。¹⁴⁸

1950年代中共推動近代史學科化的過程中，把史料整理視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1954年整理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就是堪與蔣、郭二人編著匹敵的里程碑式叢刊，而且印行極廣，其中收錄《煙嶼樓文集》之〈偷頭記〉原文（實多有誤錄）與寧波各縣志的轉述，¹⁴⁹底定了黑水黨

¹⁴² 徐珂輯，《晚清禍亂稗史》（上海：潮鋒出版社，1946）。此書為阿英主編之《近代外禍史》的一種。

¹⁴³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下冊，頁812-815，835-838。另外，有關黑水黨問題較新的專題史料，輯錄於《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頁371-383。

¹⁴⁴ 阿英，〈關於鴉片戰爭的文學〉，《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39。

¹⁴⁵ 阿英，〈致王松泉（一）〉，1957年5月20日，收入柯靈主編（下略），《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冊4，頁597。

¹⁴⁶ 阿英，〈致王松泉（六）〉，1959年12月9日，收入《阿英全集》，冊4，頁601。

¹⁴⁷ 阿英曾於《光明日報》發表從清代筆記改編為白話的〈黃將軍虎門擒義律——鴉片戰爭傳說〉（1961年12月9日），轉見《阿英全集》，冊4，頁525-528。

¹⁴⁸ 阿英，〈致王松泉（十一）〉，1973年7月3日，收入《阿英全集》，冊4，頁605。

¹⁴⁹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冊4，頁384-385、0409-410、428-429、628-629。

抗英事件的史料基礎。此後著作，如胡繩影響極大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81年初版）¹⁵⁰及姚薇元晚年寫作的通俗讀物《鴉片戰爭》，便把此事當成無可置疑的史實。¹⁵¹受這些著作影響，當代大陸的報紙及地方史志、專著、小說與教科書不斷宣傳這個故事，從而賦予黑水黨傳說以國民歷史常識的地位。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黑水黨」就是浙江省歷史地理試卷中的一道名詞解釋試題。¹⁵²另外甚至還有人以黑水黨傳說為題材，撰寫了一部長達30萬字的小說。¹⁵³而很少有人還知道，這件今日被認為是確鑿無疑的抵抗事蹟，連同過往產生的無數黑水黨傳說文本，實則都源自徐時棟在1863年撰寫的那篇虛實相間的〈偷頭記〉。

六、結語

本文是對〈偷頭記〉及其衍生文本、輯錄該文本以及間接引用這一故事的各種出版物的長時段研究。過去對此一歷史事件的考察，大都是基於極其有限的史料來討論這場抵抗活動的真實性與歷史意義，卻完全忽視了這一文本在後世的流傳情況。本研究則有兩個主要旨趣，其一是還原這一文本流傳的歷史，其二是分析這一故事的內容及其背後寓意不斷被改造的經過。這兩方面知識使得我們不再拘泥於故事本身的真實性，轉而觀察盤結於這個故事流傳史上的不同時代的人物、書籍與觀念。

〈偷頭記〉之所以在後來廣為流傳，三位晚清輯錄者居功至偉。沈鎔經、陳康祺、孔廣德將故事文本「植入」自己編著、刊行的流行書籍中，「藉附以傳」，才使得這一文本在更廣的地域範圍內傳播。清末民初之際，黑水黨已經成為報紙、雜誌與通俗小說中的常客。至九一八事變後，它又被挑選出來，成

¹⁵⁰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上冊，頁69。

¹⁵¹ 姚薇元，《鴉片戰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頁63。

¹⁵² 出題人為杭州大學講師宋顯昌。董惠民，《小寫歷史——一個普通人的六十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頁430-431。

¹⁵³ 袁元龍、肖容，《黑水黨》（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

為動員群眾的宣傳作品。1940 年代這個出名的故事最終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注意到，成為大陸中國近代史著作中一個常見的民眾抵抗事例。

在流傳過程中，故事的基本內容與寓意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首先是主角及其形象的變化。最初文本中，主角本來只是一群個人形象模糊的盜賊。然而在後來浙東的地方志中，卻出現了以徐保和黑水黨為主角的說法，並逐漸成為後世公認的事實，而主角的形象，由於 1930 年代戰爭動員宣傳的需要，也出現了從盜賊到梁山好漢、民族英雄的反轉。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教科書與通史著作基本接受了這一新形象，將黑水黨視為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下逐步覺醒的人民群众代表。

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本輯錄者與引述者對〈偷頭記〉寓意的改造。在晚清時期，故事的寓意就幾經轉變。徐時棟的創作雖然依據真實的歷史背景，但他在虛構的情節中卻刻意強調盜賊活動的自發性，弱化奕經與官方的實際策劃角色，藉以表達對清廷大軍消極行動的不滿。而浙東地方志保存這一故事，則是希望鄉人銘記鄉邦在鴉片戰爭時期極其特殊的苦難遭遇。然而沈鎔經等文本輯印者，卻不再從這個故事回憶、反省過去的鴉片戰爭，而是聯想到當下及未來。他們在故事中寄寓自己對中西關係發展的悲觀看法，認為最終的衝突不可避免，而像故事中那樣動員群眾，則是那個絕望時刻的唯一方案。1930 年代開始的歷史書寫改造與史料整理工作，又賦予該故事全新的寓意。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強調近代史中的對外抵抗，尤其希望將人民重塑為歷史的主角。三元里「平英團」與黑水黨的自發性抵抗，便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近代史敘事中重要的開端。這個故事的寓意不斷被改造的過程，為理解鴉片戰爭的歷史意義與影響提供了一種特別的認識思路。

徵引書目

一、史料（含網路資源）

- 《史館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傳 004764、002566、000649 號。
- 「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ttp://rbsc.calis.edu.cn>（2023 年 5 月 31 日檢索）。
-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光緒二十四年經濟書莊石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510022。
- 〔清〕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冊 226-228，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影印光緒二十一年賜書堂石印本。另見谷歌圖書掃描自哈佛大學藏本，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about/%E6%99%AE%E5%A4%A9%E5%BF%A0%E6%86%A4%E9%9B%86.html?id=EMrAAAAYAAJ&redir_esc=y（2023 年 6 月 2 日檢索）。
- 〔清〕文慶等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平：故宮博物院，1929，影印本。
- 〔清〕史致駟重修，〔清〕陳重威等纂，光緒《定海廳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38，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光緒十一年黃樹藩刻本。
- 〔清〕李前泮修，張美翊等纂，光緒《奉化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3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 〔清〕沈鎔經，《慧香室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7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 〔清〕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貝青喬集（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七年慧香榭木活字本，谷歌圖書掃描自哥倫比亞大學藏本（著錄誤作同治四年刻本），見：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d=oRs_cFnmJvMC&hl=zh-CN&source=gb_book_other_versions（2023 年 5 月 31 日檢索）。
-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三年申報館代印鉛活字巾箱本，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569556。
- 〔清〕夏燮，《中西紀事》，光緒十年江上草堂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018775。
- 〔清〕夏燮，《中西紀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影印同治七年刻本。
- 〔清〕徐時棟，《煙嶼樓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光緒元年葛氏松竹居刻本。
- 〔清〕徐時棟著，寧波市海曙區文物管理所整理，《煙嶼樓詩集》，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
-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冊 2，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陳康祺，《壬癸藏札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 554，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影印光緒十一年蘇州家刻本。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663053（2）。
-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陳康祺著，張壽鏞編次，《鄉諺證古》（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985010：4。
- 〔清〕黃鈞宰，《金壺七墨》，上海：進步書局，1895。
- 〔清〕楊泰亨、馮可鏞纂，光緒《慈谿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36，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光緒二十五年德潤書院刻本。
- 〔清〕董沛，《正誼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7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 〔清〕董沛，《明州繫年錄》，光緒四年刊本，谷歌圖書掃描自哥倫比亞大學藏本，見：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6%98%8E%E5%B7%9E%E7%B9%AB%E5%B9%B4%E9%8C%84.html?id=85VFAAAAYAAJ&redir_esc=y（2023 年 12 月 11 日檢索）。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冊 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
-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1936。
-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冊 4、6，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
- 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延安：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193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4-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上冊，上海：中華書局，1926。
- 伍承喬編，《清代吏治叢談》，杭州：浙江警察協會，1936。
-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
- 吳仰湘點校，《皮錫瑞日記》，冊 2，北京：中華書局，2020。
- 李孟符（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上海：廣智書局，1911。
- 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第 2 版。
- 沈惟泰，《中英外交》，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 姜俠魂編纂，《南北奇俠傳》，冊 2，上海：新華書局，1926。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511&id=027032013020476（2023 年 12 月 11 日檢索）。
- 柯靈主編，《阿英全集》，冊 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范旭倫、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冊 6，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 徐珂輯，《晚清禍亂稗史》，上海：潮鋒出版社，1946。
- 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澤昱編輯，劉悅斌、韓策校訂，《凌霄一士隨筆》，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

- 桑原隲藏著，金爲譯，《東洋史要》，第3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
- 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
- 陸士諤著，劉大軍、喻爽爽、宋朝儀校點，《清史演義》，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
- 楊靜著，吳文欽校，《寧波的民族英雄》，上冊，寧波：桃江小學，1937。
- 董惠民，《小寫歷史——一個普通人的六十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 路偉、曹鑫編集，《姚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寧波市江東區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卷》，寧波：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1989年。
- 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冊，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
-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咸豐鄞縣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
-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康熙鄞縣志（附鄞志稿）》，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
- 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整理，《同治鄞縣志》，冊1、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 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整理，《乾隆鄞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 趙爾巽等，《清史稿》，冊38，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劉承幹著，陳誼整理，《嘉業堂藏書日記抄》，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全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 魯式穀等纂修，民國《當塗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冊3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安徽省圖書館藏鈔本。
-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卷2期1（1931年3月），頁135-167。
- Anonymous.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As Sketched in Letters to His Friends, by a Field Officer, Actively Employed in that Country. With a Few Concluding Remarks on Our Past and Future Policy in China.*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 Bingham, John Elliot.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2nd ed.
- Gutzlaff, Charles.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Including a Sketch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2.
- Loch, Granville G.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The Operations in the Yang-Tze-Kiang; and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John Murray, 1843.

- Murray, Alexander.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 Ouchterlony, John.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二、報紙、期刊

- 《小說海》（上海），1915。
- 《山西國術體育旬刊》（太原），1935。
- 《中央警官學校校刊》（南京），1936。
- 《田家半月報》（濟南），1937。
- 《申報》（上海），1887、1915。
- 《竹洲》（鄞縣），1932。
- 《老百姓》（金華），1940。
- 《兒童雜誌》（上海），1937。
- 《東南日報》（金華），1940。
- 《南寧民國日報》（南寧），1935。
- 《時報》（上海），1910。
- 《浙江青年》（杭州），1937。
- 《益世報》（天津），1927。
- 《益世報》（北京），1927。
- 《陣中日報》（曲江），1940。
- 《鬥報》（蘇州），1932。
- 《新聞報》（上海），1896、1938。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三、專著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王重民、楊殿珣等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李金銓主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李致忠釋評，《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上海：光明書局，1935，第3版。
-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姚薇元，《鴉片戰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貴陽：文通書局，1942。
-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第2版。
-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 袁元龍、肖容，《黑水黨》，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
-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曹伯韓，《中國近百年史十講》，桂林：華華書店，1942。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冊1，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第2版。
-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7版。
-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1，上海：雞鳴書店，1940。
-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
- 趙慶雲，《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慶：青年書店，1939。
-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 駱兆平，《天一閣雜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第2版。
- 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 龔烈沸，《徐時棟年譜》，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
- Graham, Gerald S. *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Hevia, James L.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en, Li.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Kuo, Ping-ch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 Polachek, James M.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四、論文及專文

- 吳義雄，〈時勢、史觀與西人對早期中國近代史的論述〉，《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頁 79-101。
- 李孝遷，〈革命與歷史：中國左派歷史讀物〉，《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5 期，頁 33-46。
- 沈雨梧，〈一支抗英人民武裝——黑水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4 期，頁 62-66。
- 季文一，〈黑水黨抗英紀聞〉質疑〉，《浙江學刊》，1985 年第 4 期，頁 120。
- 林傑，〈求我山人和《黑水黨抗英紀聞》——與季文一同志商榷〉，《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4 期，頁 102-107、轉頁 41。
- 師寧，〈黑水黨新探〉，《清史研究通訊》，1989 年第 2 期，頁 7-12。
- 張桂麗，〈夏燮年表〉，收入牛繼清主編，《安徽文獻研究集刊》，卷 6，合肥：黃山書社，2014，頁 118-132。
- 陳家平，〈鴉片戰爭中的浙江「黑水黨」〉，《歷史教學》，1963 年第 6 期，頁 9-11。
- 陳傑華，〈黑水黨與「殺鬼隊」——簡介《黑水黨抗英紀聞》手抄本〉，《貴陽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 年第 2 期，頁 81-83。
- 賀秉元、屠文淑，〈浙東沿海軍民及黑水黨的反侵略鬥爭述略〉，《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0 年第 2 期，頁 8-14。
- 楊金華，〈林則徐的形象演變與記憶建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7 年 5 月。
- 劉超，〈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學術月刊》，2007 年第 6 期，頁 146-153。
- 蔡炯昊，〈抗戰時期的晚明歷史記憶與政治現實——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編作品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87-104。
- 謝輝元，〈一九四九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 年第 4 期，頁 102-112。
- Flath, James. “‘This is How the Chinese People Began Their Struggle’: Humen and the Opium War as a Site of Memory.” In Marc Andre Matten,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12, pp. 167-192.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3 (June 2017), pp. 680-701.
- Shen, Wei-Tai. “China’s Foreign Policy, 1839-1860.”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32.

The Printing History of a First Opium War Anecd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outou Ji*, 1863–1957

Zou Zicheng^{*}

Abstract

Toutou ji 偷頭記 (lit. *The Record of Stealing Head*), authored by member of the Ningpo gentry Xu Shidong 徐時棟 (1814–1873), documents a remarkable anecdote from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wofold: explo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story and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the messages conveyed by those doing the retelling. Regarding the former, owing to the efforts of Dong Pei 董沛 (1828–1895), Chen Kangqi 陳康祺 (1840–1890), Shen Rongjing 沈鎔經 (1834–1885), and Kong Guangde 孔廣德 (?–?), this local story was disseminated widely by being appended to well-received compi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book market, which ensured its later move from a local to national level of popularity. *Toutou ji* even made frequent appearances within mass media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nd has become a well-known historical ev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historians. Secondly, concerning its contents and transformed messages, much has changed from Xu's initially shaping of the story as a grievance against the Qing general Yijing 奕經 (1793–1853) and his inaction. Officials and literati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seemingly overlooked its link with the past, recontextualizing the story as a negative trope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coming in increasing contact with foreign countries. Xu Bao 徐保 (?–?) and the Heishui Party 黑水黨, for example, became widely accepted as having prominent roles in the story, although Xu never addressed either of these names originally. Mobilization and propaganda for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further created new images of the protagonists, depicting them as national heroes combating imperialist intruders. In addition, Marxist historiographical works from the 1940s onwards accepted the new images due to an urge to rewrit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stressing the people's leading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foreign powers. The dissemination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outou ji* ultimately shed new light on a hitherto untouched field and introduce an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Opium War.

Keywords: the First Opium War,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book history, historical writ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